

七

伪满的“外交”

抗日战争图书馆

抗日战争图书馆

郑孝胥与儿玉右二 在美英之间的秘密外交活动

谷次亨供稿 张辅麟整理

1932年10月初，从日本东京来了两个人，一个叫儿玉右二，是日本政友会的顾问，曾任日本商工省政务次官，既是中国通，又是美国通。日本政界，特别是外务省对他十分重视，经常向他咨询有关对华、对欧美政策上的事情；另一个叫田边敏行，山口县人，儿玉同乡，任过“满铁”地方部长、理事，是我的老领导，我曾在他负责的地方部、地方课当过课员，与他很熟。

伪满洲国成立后，经“满铁”推荐，我到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任调查课长，这时正值日本人给郑孝胥配的日本秘书官兼翻译康井尚没到任，伪国务院临时派我顶了这个角色。当时郑孝胥还兼任伪文教部大臣，他因总理事情多，文教部的事多委托我联络。因此，我同郑孝胥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这位“国务总理”在伪国务院内除他儿子外，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想必田边敏行知道这一情况，所以他们下车伊始，就先找我联络，进行活动。

记得田边是从日本人经营的高级旅馆“名古屋”打电话约我晚饭后去会他。当晚我如约前往，彼此寒暄几句后，他就把我领到邻室儿玉右二那里，相互做了介绍。田边介绍我时，着重说到郑总理对我的信任，以及我对日满关系的忠诚。介绍到儿玉时，田边结合日本政党斗争，民政党与政友会之争讲了儿

玉的作用。田边说：“儿玉先生继承了同乡先辈伊藤博文的‘武装的武备论’思想，很想在开发满洲上做点贡献。儿玉先生来中国多次，又在美国搞过两次经济调查，对于如何建设‘满洲国’很有些与众不同的想法……”话说到这，儿玉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接着又进来一个人，40岁上下。田边又把他介绍给我说：“这位是村井坚二君，是小矶参谋长的私人秘书，负责财政经济方面问题的处理。他是东京帝大经济科毕业，有名的经济专家，同参谋长是莫逆之交。这次参谋长上任就把他带来，想在满洲的财政经济上做出一番事业，希望谷君与村井君能一见如故，密切合作！”村井也没多说什么，田边又说些别的闲话，已到10点了，儿玉才开口说：“与谷君相识很高兴，我想明天晚上6点在‘曙’料理店备点粗饭薄酒，特请谷君光临。届时还有田边、村井作陪，我要谈谈这次来满洲的任务和具体内容，还望谷君多多支持予以帮助。因此，务请您大驾光临。”我自然接受了他的盛情邀请，但不知到底他们要干什么，心中怀着大疑团，告辞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6点，我准时到“曙”料理店时，只见儿玉、田边和村井3人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呢！儿玉马上将我让入上座，并吩咐侍女送酒菜，一切安排妥当后，儿玉又告诉女侍不招呼先不用来。然后，他以主人身份起身举杯说：“我是和谷先生初识，这杯酒先祝谷先生身体健康和前途有发展，我们干了这杯！”然后他又举杯祝田边、村井身体健康和事业成功，大家都一饮而尽。接下来儿玉就谈开了正题。原来这也是个侵华老手，他完全继承了伊藤博文那一套，也是“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鼓吹者，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满洲国”的成立，冲破了原来“满铁”附属地的狭小范围，在大陆政策上走完第一步。但是并没达到最后目的，最后目的是开发建设满洲，这是世界有名的大

粮库，又有丰富的资源。要实现这一切，需要大批资金，日本资本家有些人担心，不敢在这儿冒险，对军部的计划还有保留。儿玉接着又分析国际形势，认为美国一直提倡“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很希望向满洲进行资本输出，如果我们想方设法采取一定形式吸引美国人来投资，这样既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又可以缓解日美关系和美国对“满洲国”的攻击，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说到这里，儿玉抑制自己的兴奋情绪，把话又拉回来说：当然，我们允许美国人投资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遵从“满洲国”的方针，服从关东军的计划，一句话，就是要尊重“满洲国”的国策。当他发现我对如何吸引美国投资这一点有些不解时，他又具体解释了美国资金来源。原来，他的山口县老乡在美国加州一带做移民后，积蓄了一大笔资金，他准备通过交涉使美国政府允许美籍日人投资。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原来都是日本人，当然，会服从“国策”了。接着儿玉说：“这项计划，我酝酿了一段时间了，但在日本国内财阀和政党多有反对，因此，不易张扬，需要秘密进行，请谷先生代为保密；更主要地需得‘满洲国’郑总理的支持和认可，我们知道谷先生深得总理信任，希望你能充当联络人。我们此行，很想拜见郑总理，请谷先生把上述我们的计划透露给总理，待正式拜会时，我们再具体面陈。并请谷先生充当翻译，我们一致认为，你是我们这一计划最理想的合作者！”

我接受了儿玉的委托，第二天晚间去郑公馆面见郑孝胥，把儿玉来满的目的，他们计划的内容，及儿玉的出身经历和他与日本军部、政党、财阀各方面的关系，据我所知详细地做了介绍。郑孝胥这位主张“共管说”的总理，对美国财政势力的介入，自然很感兴趣，但他对儿玉似乎有点不放心，又详细询问了有关儿玉的具体情况。我又补充说：“记得日本报纸刊登过，

儿玉在日本临时帝国议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极力主张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我接触的印象，他不象一般政客，只会夸夸其谈，是个有心计、干实事的人。”郑孝胥略一思索对我说：“那么我还是见一见他，你陪他于后天晚上7时来吧！”我看郑孝胥答应会见，心里很高兴，感到不负儿玉、田边的信任，回家后，马上给田边打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一喜讯。

第四天晚饭后，我先去“名古屋”旅馆找儿玉等3人一起乘车来到东五马路郑孝胥的私邸，把他们引至西客厅。大家刚落座，不久，郑孝胥就来了，我出面将双方做了介绍。在介绍中，儿玉表示，应当去国务院拜访，但因特殊情况改在晚间来私宅拜见，有些不恭，请总理原谅。郑孝胥则说，谷次亨已向我说明了，彼此不用客气。

大家重又坐定后，儿玉开始恭维郑孝胥，说他是伟大的政治家，领导开辟满洲新天地，建设五族协和新国家，让人感佩。不过现在遇到麻烦，英、美在国际联盟里大造舆论攻击日本和“满洲国”，我们在东京商定一个办法，设法拉住美、英，这样国际联盟的孤立政策就不存在了，郑总理可以安心执行国务了。郑孝胥立即表示，能有这样的办法，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儿玉接着又说：“满洲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美、英早就了解，而且特别感兴趣。他们的调查比满铁调查部的调查还细，其中英国对冶金和煤矿经营还有丰富经验，‘满洲国’如果对外表示欢迎投资经营，英、美资本家肯定会响应，随之英、美政府也会承认‘满洲国’的。”

听儿玉说到这里，郑孝胥插嘴说：“对于欧美各国企图来投资的情况，我早就知道，我陪伴溥仪执政在北京、天津居住时，常同在华北的英国实业家来往，他们都表示愿在中国投资办企业。他还时时引用开滦煤矿的例子，认为办得成功，投资不大，

效益大。我在上海隐居时，也常有美国朋友去看我，他们也多次说起，美国出口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一定位置，不比英、法逊色，但是投资办企业的却不多。不是美国人不想干，中国市场大，劳动力便宜，确是理想的投资环境，就是中国没有统一政权，总打内战，使美国人感到投资缺乏保障，不敢冒风险。我当时也只能听听而已，现在好了，‘满洲国’成立，我们是应该欢迎美、英各国前来投资帮助开发，我想应该给他们以必要的保障条件，保证其最低利润指数，只是不知他们的政府是什么态度，他们会正式承认我们满洲国吗？对于这一点我还有些怀疑。”

儿玉说：“总理阁下的担心和怀疑是很自然的。但那是过去由于中国不统一，政府对民族工商业也不支持，在外国就不是这样，无论哪一国的政府，没有不关心他们资本家投资事业发展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日本在上海的‘三井物产支店’以上海这一南北物资交汇地为中心，每年经营额不下十几亿美元，所获利润在日本财阀中是最高的，若没有日本外务省的支持，三井是不会顺利开展经营活动的。所以大家说，驻上海日本总领事与三井支店长是异体同心的关系。开滦煤矿，刚才阁下举例说过，它也是英国公使同北洋政府交涉的结果。由此推及，我们设法推动美、英民间交易，那么也就等于推动了美、英等国与满洲国的外交了。”

郑孝胥听了儿玉的解释后，沉吟一会儿说：“你讲的有一定道理，只是不知你们对于推动英、美投资工作有什么具体方案，我愿闻其详！”

儿玉说：“这正是我拜见阁下要面陈的主要内容。满洲物产丰富，人力也多，但是由于现代技术落后，要使满洲国强盛起来，必须积极进行开发，这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一致意见。若

开发，必须有资金，日本财阀只有三井是支持政友会和军部政策的，但它的资金有限，若真正把满洲开发起来，必须有美、英等国来投资。当然，他们若来必须遵守满洲国国策，服从关东军计划，既开发产业又从事军用物资生产，不然，我们是不允许的。”

郑孝胥问：“按这样的条件，美、英资本家肯干吗？”

儿玉马上兴致勃勃地说：“就是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我做过调查，那就是动员日本移民美国的资本家投资。我的家乡山口县在美国加州移民不少，他们在美国东海岸经营农场、果树园，积累不少资本，用来投资给我们是足够用了。问题是这笔资本受美国政府控制，不经政府同意，难以拿出。”

郑孝胥又问：“这笔资本款项，大体有多少呢？儿玉先生说何妨？”

“据我所知，大约有19亿以上美元！”

“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呢！但是现在美国在国联一劲儿反日，又拼命反对满洲国，要使他们同意投资，怕不容易吧？”郑孝胥又试探着问。

儿玉摆着胸有成竹的架式，摇摇手说：“总理阁下，不要光看表面现象，那是一种外交辞令、威吓手段。美国越是在国联喊得凶，越证明他们对满洲感兴趣，投资的热情高。所以我们应该拉拢他们，满洲国政府给他们最优惠待遇按年5厘或6厘行息，使他们的投资决不亏本，同时提出交换条件，允许加州日本移民将积累也投入进来，这么一来问题不全解决了么？”儿玉越说越来劲儿，他看郑孝胥听得挺入神，就又接着说：“下面我再把投资设想的计划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们打算，开始让美国拿出20亿美元，加州移民拿19亿美元，日本军部再筹划一下，也搞成20亿美元，以这几十亿美元

为基础，在新京成立一个‘国际银行’总行，另在奉天、哈尔滨、牡丹江等地设立‘国际银行’分行，由分行直接向各地投资，总行统制管理，阁下领导的国务院对总行负有指挥监督权。总行设总经理，拟定由美国人充当，副总经理由日本人充当，总经理负责决定该行的投资经营方针，如果有分歧意见，由满洲国政府决定。平时该行决定的大的方针政策也必须经满洲国政府认可，该行如有违背，满洲国政府有权命令其停业甚至冻结资金。

设立‘国际银行’想充分开发动力资源和军工企业，如把北满的鹤岗和东满的密山、穆稜、鸡宁、鸡西等地矿脉全连接起来，使其规模超过抚顺煤矿。

在东边道利用鸭绿江水，搞一个大型水力发电站，在安东建一个大型港口，以奉天、安东为中心形成军工企业生产地带。

在南满，要在以后开发热河的金、银、铜矿资源，也要把西安（今辽源市）煤矿和阜新煤矿加以扩建。

这些开发扩建计划由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相商决定，做为‘国策’确定后，阁下领导的国务院即按此计划指挥‘国际银行’来逐项投资，以上这是对美国说的。至于对英国方面的投资计划，我们打算在南满本溪湖附近‘官原’建立一个年产50万吨的冶金联合企业。同时在奉天省管内的松岗、杉山两个煤矿也要让英国投资开发，其监督管理形式和美国一样。

这个方案是我们在东京酝酿的，是从日满一方面考虑的，还不知对方英、美的想法呢！再说这是具体关系到满洲国的事情，请郑总理提出意见，我们共同研究。”

郑孝胥听到这里，才算明白儿玉的真正意图，事情虽然来得突然，但由于他在思想上一直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自然赞成让美、英投资。因此，他立即明确表态说：“这个方案

很具体、周到，我没有什么意见，反正他们只是投资的股东，在政治上是没有权利的。不知下一步准备怎么推行这一计划？”

儿玉说：“从东京来时，有关方面说，必须经郑总理认可，没有您的支持，我们不能走下一步！”

谈到这里，儿玉将了郑孝胥一军，而郑回答得也很干脆：“我是已经同意认可了，如果需要执政认可，我明天就去请示！”

儿玉见状，笑着摆手说：“不用给执政添麻烦了，只要阁下认可就可以了，您是满洲国的总理嘛！事情既然说到这种程度，我还可以告诉阁下，由于英、美在国联拼命反对日本，使日本在外交上很被动。为调整关系，也为了抓紧时间，没同满洲国打招呼，在7月间由日本有关方面根据上述方案和美、英等国秘密商量过。这种情况，请阁下原谅！”

闻听此情况，郑孝胥倒是没有什么不悦的表情，只是又问了一句：“那么说这个方案，是已经经过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的？”

儿玉说：“还没有拿到日本内阁会议上去，但参与这一方案的人都是有权威、有影响的人物，除我而外，有陆军省次官小矶国昭中将、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调查部长东条英机少将、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并兼支那课长喜多诚一少将、参谋本部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少将等。由这些陆军的中坚人物一起研究；然后又经日本陆军最高三长官：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总长榎崎大将、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大将，外加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和政友会顾问松冈洋右等要人研讨认可后，责成我和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一起将本方案向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文化部长冈田等人透露。他们表示赞成和支持这一方案，但作为外务省不便公开支持。然

后我们又和外务省有关方面选定美国财阀中与现今执政党关系密切的‘摩根金融集团’和英国工党有关系的‘伦敦冶金煤矿联合企业组合’做为合作对手，具体联络工作由外务省负责指定专人进行。

同美国进行联络的是由驻纽约泽田总领事和哥伦比亚大学东洋史教授赤十两人暗中进行；英国方面，则由日本驻英总领事进行，他们都是以满洲国政府郑孝胥总理委托人的身份从事活动的。”

听到这里，郑孝胥关切地问：“同英、美方面联络进行得怎么样了呢？”

儿玉踌躇满志地说：“进行十分顺利，就在7月份，摩根财团已答应投资，并说日本移民积累也可在美国以外地方动用，而且其亚洲营业部长很快就要经菲律宾去东京商谈投资细目。英国也答应投资。他们还都表示要敦促政府早日承认满洲国，以便投资更有保障。”

说到这里，儿玉停顿一下又接着说：“不瞒总理，在对满洲政策上，我们国内分歧很大。为保证上述方案实行，我们同陆军省研究，特别选调身份高、政治上强的武藤信义任司令官，和小矶国昭任参谋长，以保证我们方案的顺利推行。具体地说，这一方案的执行人由我、田边君和小矶参谋长，但小矶又不便公开活动，又特请村井君做他的代理人，由我们3人具体筹办。但事情没有落实之前，涉及国际外交，又必须保密，这就是我所以晚上来私邸拜访总理的原因。”

郑孝胥表示，完全理解，赞成保密，但是郑又追问一句：“这一方案，日本内阁当局谁也不知道吗？”儿玉承认除了陆军大臣之外，谁也不知道。儿玉怕郑担心这一方案在日本的影响不大，急忙又解释，方案是在陆军内酝酿的，这些人不仅决定

对内政策，也决定对外政策，是绝对影响政局的。他们决定的事情经陆军省提到内阁，没有否认的，使郑孝胥对“陆军至上主义”在日本的影响有所认识。儿玉又假惺惺地表示，这一方案关系满洲国国策，日本内阁不能代替讨论，只是代理满洲国，帮助斡旋罢了。这番解释说得郑孝胥既放心又舒心，特别是听到儿玉最后说：“日本政府对于本方案丝毫没有容喙之地，只有阁下有首肯权”更是感到称心。郑孝胥再一次表示，委托儿玉等人，他十分放心，请抓紧进行。

最后儿玉又小结式地说了几点，他说：“我虽然是在私邸访问，但我确为日本政府的一个代表，是郑重严肃地向阁下报告计划方案的。目前由于满洲国不便同美、英直接联络，只能委托日本有关人员代为进行，郑总理必须承认这一切，我们才好进行。”郑说：“你不用重复说了，我早已听明白了，我是承认和认可这个计划方案的，我授给你们代办的权利，请先生回去复命吧！”

儿玉见状马上站起来向郑孝胥伸手边握边说：“真是名不虚传，不愧为大政治家的气魄，我感谢阁下的承认和支持。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允许美、英投资，要有限制，必须遵守‘满洲国’法令，用法令来指挥监督。制定法令，是个技术和经验问题，日本一定推荐有名的立法专家帮助制定有关法令。”

这次谈话持续很长时间，田边和村井没有说什么，主要是郑孝胥和儿玉交谈，我在中间做翻译。接近夜深时才结束，我们4人乘车走的，郑让我把他们送到旅馆，之后我才回家。

过了一天，郑孝胥让我晚间7时去他那里，我按时到了郑公馆。郑见面后告诉我，昨天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来拜访谈了两小时，谈话中问到儿玉来拜访的事，很是夸奖了儿玉一番，并一再说儿玉言行不是个人所为，是代表日本有关方面的，陆军

支持儿玉，希望满洲国要绝对信任儿玉。郑孝胥对我说：“看来儿玉右二这个人挺有来历，你熟悉的田边敏行也不简单，武藤也称赞了一番。儿玉刚访问我，武藤又来谈话，看来这个计划正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意思，我前天晚上说的话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吧？”我说：“总理看的很对，说的很合适，态度也明确，我看没什么问题。”

就在我从郑公馆回来的第二天，田边给我打电话，让我同郑总理联系一下，他们晚间要来拜访，是否可以？我马上找郑，郑让他们晚7时来。晚7时，我们一块来到郑公馆，儿玉见了郑孝胥的面马上说明是来辞行的，他们定于明天起身回东京。郑挽留他们后天走，为的是想设家宴招待招待。儿玉表示心领总理好意，只是不能多留，东京来信说摩根代理人快来东京，不少事情需要准备，以后同总理联络的机会很多，不会少吃饭的。并最后决定联络的办法，是用带暗号的挂号信来回传递情况，由儿玉寄给我，我再译成中文给郑。因儿玉他们急着走，很快就告辞了，我陪他们回名古屋旅馆，到儿玉屋内小坐。儿玉拿出两个本子，是他和田边临时用日本字母编的暗号本，一本给我，以便他们来信时我按此本暗号翻译，我要代郑写信也用这一暗号。儿玉和田边嘱我，不管多急的事，千万不能用电话、电报，以免漏了出去。同时，儿玉还告诉我，他们访郑第二天，即将情况向武藤信义、小矶国昭做了报告，武藤和小矶对郑的慨然支持态度十分满意，希望我有机会把这意思转告给郑。当然，田边他们最后还向我表示了感谢，一再声称，决不能忘了我的辛苦……

儿玉等人回东京不到20天，就来了一封挂号密信。信中说，回去第五天就同摩根财团金融部亚洲营业部长劳巴特及其随员进行了谈判，他们希望在满投资额不限于20亿，越多越好。除

了允许英国在本溪投资外，再不要引进其它国家投资，自然，日本财阀要除外。劳巴特除对满洲国政府计划搞投资有兴趣，还希望对民间企业也参与投资。对于国际银行的人事安排及待遇，希望满洲国政府不干预，至于满洲国政府对投资的监督法令希望早些公布。儿玉信中认为，劳巴特的要求是正当的，他已代表郑基本上答应了，至于监督法令，很快就要发表，基本和日本现行的一样，儿玉赠送一部日本的，让他们先做参考。劳巴特表示马上回国向摩根财团报告，更要向美国政府传达满洲国政府对美的诚意，交涉在美国日本移民投资以及催促政府改变对满政策，承认“满洲国”。信中还说劳巴特留下两名助手，随时联络，儿玉已在东京找了两名法律专家做监督法令的制定的准备工作。

以上这些信中的内容，我译好交给郑孝胥，郑看完信，很高兴，直说：“没想到，事情进展这么顺利，第一步就成功了。谷次亨，你快点写信，告诉儿玉我同意他的安排，我继续等他的好消息。”我急忙用暗号写成信给儿玉寄走了。

12月末，儿玉从东京寄来第二封信。信中写道：“劳巴特转达美国政府方面愿望，一是希望知道，‘满洲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时代和外国所签条约及协定是否承认并承担义务；二是希望了解日本与‘满洲国’的特殊关系，请说明一下日‘满’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我们经研究后，代为答复说，‘满洲国’政府对于过去所签条约，不但承认，还承担义务。至于日‘满’议定书内容，不对其它国家公开，对中日两国人民也不公开。但美国政府如担心日‘满’议定书对美国投资有影响时，‘满洲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可以同美国政府签订一个保障投资的条约或协定。以上内容呈报总理，还有什么指示盼赐。”我将该信译文交给郑，郑看完后对我说：“美国对投资有些顾虑是正常的，

考虑问题很周到，儿玉的答复也很圆满，你代我回信鼓励鼓励他，特别是关于日满议定书的答复太好了。”我又按郑的吩咐给儿玉寄去了回信。

1933年1月末，接到儿玉第3封密信。信中讲到，劳巴特从美国来信言说，美国政府对于“满洲国”在世界上未来发展趋向及治安情况不大了解，也不好预测，没有什么把握。因此对于摩根财团投资，必须有一个前提，即由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签一条约，保证美国投资在“满洲国”如受到损失时，日本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并负责全部赔偿……不然，美国政府决不允许投资，承认“满洲国”也是不可能的。情况有了变化，在东京大家再三研究，感到按日本政府惯例，对外缔结条约，必须由法务省制定，再同外务省商定共同提交内阁审查，审议后才能正式与外国签订，之后还要经帝国议会批准才正式生效。所以法务省是关键，我们几次同法务省交涉。他们以内阁没有授权，不能根据军部单方面意见制定。为疏通关系，又特别找了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他是法务省官员出身，多年充当大臣，现任官员多是他的旧部。由铃木出面找法务省会好办些，铃木也答应了，并多次与法务省交涉，但法务省当局迫于民政党主政内阁的压力，反对军部的对“满”方针，拒绝了铃木的要求，因此，美国要求订约一事，只好暂先放下。但儿玉在信中继续说，让劳巴特向美国政府做工作，让美国直接到满洲来参观考察治安情况，估计他们看了“满洲国”实情之后，会坚定投资信心的。

我将这封情况有变的长信译好又送给了郑，郑边看边说：“没有想到，日本国内情况这么不一致，对‘满洲国’的方针还有分歧，这事暂先放放，不管进展如何，对儿玉他们的工作，我们还应感谢，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好事多磨嘛！没有一帆风顺

的事情。”

我仍及时按郑的意见，给儿玉复了信。

我的复信，寄走没几天，接到了田边给我个人的来信，信中提到铃木去法务省交涉未成，很损他的面子，政友会趁机活动，估计日本政局发展很快，就要更换内阁，上台的是政友会，政友会支持陆军的对满方针，届时与美国签订投资保障条约，不会有问题，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田边让我将这一情况告诉郑总理。我随即也向郑做了报告，郑也对政友会感兴趣，他说我们等待日本政局发展吧！

1933年4月，我调到伪民政部警务司任外事课长。因为伪满政府成立除日本外，当时没有承认的。可是一些国家侨民还在东北，有事情他们不愿找外交部交涉，都找警察厅交涉，于是伪满中央政府只好在警务司里设外事课，负责对外联络。也正在这个时候，又接到田边的挂号信，告诉我日本外务省以岗田文化部长名义请美国著名记者团来日观赏樱花，并安排他们去满洲参观，要好好接待。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郑，郑嘱我好好接待，并让给田边回信，我照办了。

不过十几天，关东军第四课长原田熊吉，告诉警务司长长尾吉五郎美国记者团来访接待之事。长尾把我找去交代说：“这事由你和关东军御厨外事科长、日本大使馆花轮二等书记官和外交部通商司加藤通商科长一起接待。美国记者避免同外交部门及政府通商部门接触，你是从民政部角度去的，所以你是主要代表，有关满洲治安及资源情况你都要做详细介绍，引起他们对满洲的好感和产生向往，激发他们的投资热情，这是你接待的主要目的。花轮、加藤都会说英文，你用日文讲，他们给你译。”

第二天午后，我从新京出发，第三天早抵安东。没过几小

时，从朝鲜开来一列车，其中一节专车坐的正是这48名美国记者团成员。他们在日本参谋本部高级参谋原己中佐的带领下，下了车，彼此做了介绍。于是我认识了他们的团长纽约时事新报主编威廉先生，并表示陪伴他们去新京，有什么事，一定效力。威廉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答是中国人，威廉说：“中国人都会讲英语的”，我说：“学过，忘了。”他又问我：“在那儿读书？”我答：“在东京读过书。”威廉似有所悟说：“所以你会说日本话。”说话间，火车快到本溪湖车站了，威廉拿出地图看着说：“本溪湖，不就是能产煤铁的那个地方吗？”我说：“是的，就是那个地方！”威廉又说：“谷先生能不能将本溪湖煤铁生产及企业情况介绍介绍呢？”我一听，宣传机会来了，马上说：“当然可以！我曾在本溪湖煤铁公司做了8个月的主任秘书，了解不少情况，愿向诸位介绍。”我刚说到这里，四散的记者都围了过来，于是我就讲起本溪湖煤铁公司怎样由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投资与奉天省政府开办的过程，以及该地煤铁资源多么丰富，工人劳动力多么便宜，并当场算了笔帐，说明大仓财阀如何大赚。在场的记者不少人露出羡慕的神色，有的人就问我矿藏情况，我说都是富矿，品位在六成以上。并进而宣传说，类似本溪湖这样的矿藏，满洲还有很多，我们欢迎外国投资，象大仓那样既帮我们开发，又获高利……

有些记者被我的宣传打动了，又问我治安和交通情况，我都做了保证式的答复，总之一切都没问题。也有记者问了目前外国居留民在满生活情况。最后，我针对美国情况，强调了欢迎美国资本家投资开发，并保证说一定给予最惠待遇，贷款收取最低利率。他们边听边记，眼看到了奉天站，我也完成了任务，就将他们安顿在大和旅馆，由加藤具体照料。

这批记者在奉天参观了北陵、东陵，受到日本总领事峰谷

的热情接待。第二天，他们一行48人来到新京，小矶参谋长设宴招待。在宴会上，小矶宣传了日满关系，以及欢迎美国投资，保证不能受损失等话。活动了两天以后，他们去哈尔滨，由哈去大连，走海路回日本，由日本回国了。

当年秋天，9月末，我又接到田边来信，内容是说英国伦敦冶金组合主任巴宾也应日本外务省岗田文化部长之约，由香港到东京。一行4人，其中还有组合的两名理事，他们将去满洲视察，请我接待。我将这一消息告诉郑孝胥以后，郑说，象上次一样，搞好接待。没几天，果然，关东军第四课通知我参加接待，还是上次那几个人一块去安东迎接。他们坐的是头等车，3个人年龄在50岁以上，寡言慎行，彼此做了介绍。他们偶尔谈点闲话外，基本不问也不说什么。在奉天，受到蜂谷领事接待，土肥原也出面举行宴会。第二天即来新京，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芳泽和新京特别市的交际处长马显异等人出面接待。

据说关东军小林中佐代表小矶参谋长同他们做了长时间会谈。他们出席了小矶的晚宴。以后他们也同美国记者团一样，由哈尔滨转大连；从海路去日本回国。

以后，儿玉、田边也不再来信，关于美国、英国投资的事，也就没有任何下文了。

一次赴中国内地视察的阴谋活动

古海忠之

1935年7月初旬，伪满洲国政府决定派遣由日本人官吏组成的赴中国视察团。此案的提议人是谁，又是谁决定的，我不

大了解。不过根据前后的情况来判断，我想，是由当时总务厅弘报处长官胁襄治发起的。他原来是陆军省与报导部有关的军人，新设弘报处时，由于关东军的推荐担任了第一任弘报处长，精通中国的情况，第一次上海事变时曾到上海工作过。又经总务厅长长冈隆一郎、总务厅次长大达茂雄等政府首脑研究后决定，并得到关东军的承认。

被选定的视察团员如下：团长官胁襄治（总务厅弘报处长）、毛里英蔭免（主计处一般会计科长）、古海忠之（人事处给与科长）、椎名悦雄（产业部总务科长）、栗原实（民政部总务科长）、永井哲夫（财政部关税科长）、松崎健吉（财政部金融科长）、寺尾属官（中文翻译）等，此外还有驻“满”日本大使馆的筒井书记官，一共是9个人。出发前在一个准备会上，官胁团长指示说：“鉴于目前中国抗日运动的情况，用满洲官吏的取名是不大妥当的，各人应适当地找一个伪装职业，姓名可以不动，要找些如大学教授、公司董事、公司理事等衔，并印制名片。”我用了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名义，筒井大使馆书记官使用了原来的职务没有变更。这样开始了由日本人组成的赴中国视察团的旅行。期间大致是40天，视察计划是由官胁团长拟定后经大家同意的。有关领导、联络、手续等事务由团长负责，旅费及其他有关金钱的事务由我来负责。

起程前一天，全体人员在长冈总务厅长室集合，接受了大体如下的有关视察的指示：“满洲原来是中国的一部，因位置偏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低于中国内地，同时在各方面和关里有共同之点，受关里的影响。因此在满洲政府的日本人，无论怎样应该知道中国内地的情况。这次各位到中国去视察正是为了这个。希望很好地观察，加深对中国的认识，这对将来做好满洲工作一定会有帮助的。”

可见，中国视察团的目的是视察中国现状，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以便将来在伪满政府更好地执行各项行政职务。然而，现在回首正视我们视察中国之行的本质，其目的显然在于，掌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内地的实际情况，加深认识，将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以便根据这种认识，强化和调整伪满政府的各种政策，确保以至扩大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东北的侵略。

视察的路程：7月15日前后由新京出发往天津。在天津常盘旅馆住两宿，曾到日本华北驻屯军拜访参谋长酒井隆，并由池田参谋给我们讲解华北的一般情势，抗日运动的现状和各国在华北的投资情况及各种势力关系（主要为基督教的旧教和新教的势力）。在日本领事馆调查了天津市的人口、租界的情况特别是有关日本人的经济情况。又到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经理姓斋藤）调查了天津进出口货物的情况（特别着重了解同日本、满洲的贸易往来关系）、金融情况、日元流通状况、各国的经济状况（这时更加认清了对转运站——大连的地位，特别是从排斥日货的角度来看大连的重要性）。所有这些调查都认真记录下来，同时也参观了天津市。

在北京住5宿。到日本大使馆由若杉参事官报告华北经济产业情况、有关同中国的经济往来情况，又搜集了关于北京的一些基本情况资料。在北京除若杉参事官招待我们以外，没有其他应酬，尽情地游逛了北京城。为了去山西太原，乘火车先到大同，在大同煤矿事务所住1宿，参观云岗石佛（往返全由傅作义军警卫）。第二天本来预定坐汽车到太原去，因下雨有危险回到北京。在北京扶桑饭店住1宿，第二天往石家庄，在石家庄稍微休息后赴太原。

在太原中国旅馆住两宿。招待我们的，我记得是大仓商事社的驻在人员，听了关于山西省的生产状况，特别是煤和铁

的情况及山西门罗主义的报告，并领了有关资料。我们很为该地丰富的煤的资源而吃惊。参观了山西省经营的纺织工厂和烟草制造工厂，游逛太原市，晚间接受省公署秘书长（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军人）的招待。经石家庄赴济南。

在济南鹤屋住1宿。到日本总领事馆领取关于济南的人口、产业、经济等特别是与日本有关的资料，并听取了中国情况的报告。游逛了济南市。

在青岛大陆旅馆住1宿。在领事馆听取青岛进出口货物、经济、产业及其他必要事项介绍，知道该市的经济，有60%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乘船赴上海。

在上海大和旅馆住1个星期。拜访了日本大使馆有吉大使，同堀内书记官等人开座谈会。听取了中国的情况介绍，也介绍了满洲的情况，还谈到最近中国的动向，特别是第一次上海事变以后，中国对日本的动向以及介乎其中的英国的态度等。又从日本特务机关影佐中校那里听到了同样的介绍。并在上海日本居留民会召集了各种专门人士，请他们详细介绍上海的产业、金融、经济、贸易等情况，还有关于租界的情况，各国在上海的势力关系特别是日本人的势力等等，我们均作了记录。还访问了正金银行，调查了金融情况，特别是有关英国金融的情况，知道了英国在华中的金融势力是十分雄厚的。参观了上海各国租界，和以“上海事件”出名的闸北，以及日本租界里面的侵略战争的战迹、大上海建设的情况等等。“中国地面有危险不要去”，我们接到这种告诫，因此没敢接近，主要在租界地活动。在华北没有感觉到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气魄，但到了上海则相反，开始体会到这种反抗力量的强大。向南京去的途中路过苏州，参观了著名的寒山寺、豫园等，但没在苏州停留。

去南京，在南京旅馆住两宿。在日本总领事馆由须磨弥彦

总领事就国民党政府的施策，特别是“新生活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有名的秦淮热闹街被封闭，也看到了南京都市计划的情况。在参拜中山陵的路上，或游逛市街时，遇到几处抗日的演说，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在上海的体会。回到上海在大和旅馆住1宿，然后乘船赴香港。

在香港松原旅馆住两宿。访问了日本总领事馆，抄写了各种资料，如英国统治香港的情况，对中国输出和输入的货物，特别是关于香港“上海银行”的资料等，发现该行的银行券发行额特别多并且基础雄厚，我为此大吃一惊。华中、华南很多人认为储存香港、上海银行券是最可靠的储蓄方法，据说把数十万银行券密藏在家里的人，是不在少数的。我们更知道了英国在中国的金融侵略势力，感觉到对日本的威胁，是个强敌。

然后乘船赴广东，在松原旅馆住两宿。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白田中佐详细讲述了华南情况，排外、排日情况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五年计划并领到了相关资料，又请白田中校替我们联络到广西桂林去，预购了飞机票。又从驻广东的安村“满铁会社”社员那里得到有关广东方面的资源、出产、经济等资料。广东省内没有一个外国人居住着，所有的外国人全被赶到“沙面”，我看见进入沙面的桥口上有碉堡，有铁丝网。在街上游逛时，看到青年男女带着鲜花参拜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墓。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斗争气魄，形势迫使我们开始预料日本帝国主义今后的侵略路程，将遇到中国人民顽强的抵抗。晚间，广东省军参谋长招待我们吃晚饭，并给我们讲述了广东省的未来瞻望。因大雨飞机两三天内不能起飞，结果放弃了到广西去的打算，回到香港，第二天乘英国船回到上海。在上海住两宿又乘船回到大连。没回新京以前，在大连大和旅馆全体人员开了一个会，就这次视察旅行的收获和结论交换了意

见，统一了认识。综合各种资料和感想，全体一致的看法大致如下：

一、华北虽有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投资与企业，但力量不大；惟有日本势力最强，因此能够成为日本的经济圈。华中是日本同英国的势力竞争圈，特别是英国金融势力值得注意，将来可能在这上面发生日英间的纷争。华南只有英国金融势力，日本根本就不成对比，无法与之抗衡。

二、中国的抗日运动，今后愈益炽烈，其范围也要扩大，不久也许会席卷华北波及东北。因而排斥日货将越发激烈，日本经济势力可能要缩小。必须警惕英国的谋略活动，更要考虑利用大连和东北作为消化日货的市场。

三、“广西五年计划”、“新生活运动”等，虽然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不足以为范。如果满洲在日本控制下以自主的立场进行建设，相信能够越过中国内地的经济变化。

根据上面所谈的，我们的结论是迅速地培养、强化“满洲国”，使其成为具有实力的国家。这样才能成为日本的市场，成为日本势力圈的核心一环。另外，认为这种视察旅行帮助很大，决定给政府建议，今后固定为一种制度，年年实行。

回到新京不久，邀请政府首脑召开了一个报告会（我记得关东军第四课也参加了），把搜集来的资料再加上感想即上面谈的结论，由各部分负责人和团长作了详细的报告，与会者都很满意。我在出发前，就接到了关东军的临时召集令，经由申请后允许我暂缓应召。因此视察旅行结束后，立即赴郑家屯没能参加报告会。当然我回来以后，也立即向总务厅长、总务厅次长报告，更不难想象向所有认识的人谈论过旅行的情况。

这次到中国视察旅行行动的实质，可以这样说，我们到了中国各个地方，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实情况，也

认识了这种侵略即将引起中国人民全面的反抗，其结果，将来必然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扩大侵略。处在这种情势下，更清楚了“满洲国”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在剥夺东北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迅速强化“满洲国”，以便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东北。基于这种认识，不仅激发、提高了我们建设满洲的积极性，同时也用这种认识影响了别人。此外，强化伪满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好地控制东北的结果，是打下了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基础。这样看起来，中国视察旅行有重要意义也有犯罪性质。而且更严重地是由于我们的建议，中国内地视察旅行和欧洲视察（每年约有两名）成了伪满洲国固定的日本人官吏的国外出差制度。我身为视察团的一员承认它具有情报谋略的犯罪性质。

伪财政部大臣
孙其昌两次朝鲜之行

王裕五

一、缔结“日、满税关协定”

1935年5月26日，伪财政部大臣孙其昌，代表伪满洲国政府，在朝鲜京城（汉城）同日本政府的朝鲜总督宇垣一成，举行一次“日、满税关协定细目”的签字式。细目的主要内容，是列车运转直通图们江、“满”、朝鲜国境时，关于如何使税关手续简捷化的协定，其中附带细则有：

1. 基于日、“满”条约的缔结，“满洲国”得在朝鲜北部的

三港——雄基、清津、罗津及上三峰等地，设立图们税关办事处，办理税关事务。

2. 凡依铁道经由三港——雄基、清津、罗津等地，向“满洲国”输出输入货物、小荷物、托送手荷物及旅客随带小荷物时，可以在各前记地点的日、“满”税关，进行办理关税的手续。

3. 凡依铁道经由图们、上三峰两地，向“满洲国”输出输入货物、小荷物、托送荷物及旅客随带小荷物时，须在图们或上三峰的日、“满”税关，进行办理通关的手续。

按照这次的日、“满”税关协定，自然是方便了双方面旅客的通行，然而究其真正的目的，无非是更便于日寇对东北物资的尽情掠夺而已。当孙其昌新接任伪财政部大臣不过两三天，伪总务司长星野直树要求他到朝鲜，说什么能够借着这次的签定日、“满”税关协定的机会，同朝鲜总督宇垣见见面，想来也是大臣所喜欢的。孙其昌自然是很同意星野的意见，过了两天，孙其昌带伪财政部的关税科长永井哲夫、银行科长松崎建吾、秘书长胡宗瀛、秘书官王稔五和伪外交部的外间事务官等做随员，乘坐直通釜山的快车一路直奔朝鲜。当时同车的另有日本大使馆花轮参事官，他是日本政府派遣到朝鲜参加这次签字仪式的。午夜到京城，孙其昌等一行，受到朝鲜总督府政务长官的欢迎，下榻于京城旅馆。

次日上午，孙其昌及其随员到总督府面会总督宇垣及他的政务长官。下午，政务长官到旅馆来回访。晚间孙其昌等一行出席了政务长官的招待宴。第三日上午，在总督府举行了“日、‘满’税关协定”的签字仪式，宇垣、孙其昌各有简单的致词，历时不过30分钟而结束。这天晚上，宇垣为孙其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宴，在京城旅馆的大餐厅里，有驻京城的日本文武官员和日本、朝鲜工商各界二百多人来作陪。席间宇垣致词，对

孙其昌这位伪财政大臣大加赞许。说什么，孙其昌阁下不但是满洲国唯一无二的财政专家，而且是满洲国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又说什么，孙其昌阁下不但是对满洲的财政情形最为熟悉，而且是对世界的政治趋势更是清楚。还说，孙其昌阁下在满洲事变前主张实行亲日政策，在满洲建国后极力推行日、“满”合作，所以说，孙阁下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希望孙阁下在政治舞台上能够大显身手，为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事业努力奋斗等等的鬼话，令人头晕目眩。

继而孙其昌在答辞中，对于字垣一成也是极尽恭维。讲了一套字垣总督是日本军政界的元老，德高望众，是如何的早为自己所尊敬等等。一阵的互相吹捧，弄不清他们的真正用意何在。席散后，朝鲜银行总裁为了酬谢伪满政府对于在东北各地的朝鲜银行支行的关照情谊，要求为孙其昌一行再次举行宴会。在明月馆，宾主双方虽然不过二十几个人，但是准备得非常豪华，朝鲜料理每人1份，山珍海味俱全，每份菜谱二十多种。据说每份30元的席价，在朝鲜料理中向来没有这样豪华的。并且把京城有名的朝鲜妓生二十多名全部叫来入席劝酒，可以说一顿饭吃掉了劳动人民一年的血汗。这些妓生都能写能画，能歌善舞，她们在劝酒中间，要求孙其昌题字留念，孙其昌慨然应允，每人送给她们一把扇子，并且当场在扇子上面题字。这些妓生欢喜得如获珍宝。次日午车，当孙其昌一行就归途在京城车站上，这些妓生又来站欢送。

在归途的列车上，永井哲夫关税科长对我讲，孙大臣阁下这次的朝鲜旅行是很成功，字垣总督对大臣的衷心赞扬是不可多得的，朝鲜银行总裁对大臣的热情招待也是最豪华的，朝鲜妓生对大臣的车站相送更表现出她们的至诚恭敬。接着他又说，这些妓生都拥有几万元以上的财产，其中有几名拥有十几万到

二十万元，一把扇子虽然不值几个钱，但是大臣能给她们在扇子上题几个字，这是她们最引以为珍贵的纪念品。我听了之后心中暗想，如果不是为虚荣观念所驱使的话，另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二、参加雄基、罗津开港式

伪满建国初年（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如愿以偿地开始修筑吉敦路的延长线——敦化至图们，整整一年的工夫修完。从此吉长线、吉敦线、敦图线三线连接一起，总称为京图线（伪满首都新京——图们）和伪满国境图们江对岸的南阳站（北部朝鲜的铁路）相连接。而另一条线，则接通了朝鲜北部的会宁、上三峰。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同东北军阀之间，多次交涉的所谓修建“吉会路”——吉林、会宁间，今天得以实现，于是朝鲜的东北部同伪满的国境延边之间，铁路相连畅通无阻。而日、伪满两国政府，把这双方面的铁路，都委托给“南满洲铁道会社”一手经营，完成了日寇所谓“满鲜一家”的初步计划。

接着日本政府为了其掠夺东北资源而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京图线输血路的作用起见，又委托满铁在朝鲜的东北部的罗津、雄基地区进行修筑港湾。从1932年5月至1935年11月，费时3年半的时间，满铁把罗津、雄基的第一期建港工程初步完成。日本政府对此（同清津连在一起），称之为“北鲜三港”（清津、罗津、雄基），说什么这是日本海初步走向湖水化，给以很高的评价，并且说：随着“北鲜三港”的建立，缩短了日本同满洲的距离，开辟日本至满洲间的最捷途径。据其当时按4条路线列表说明：

伪满新京——大连——下关——日本东京，是3 000公里。

伪满新京——釜山——下关——日本东京，是2 860公里。

伪满新京——罗津——敦贺——日本东京，是2 404公里。

伪满新京——罗津——新滨——日本东京，是1 850公里。

可见日、伪满两国间经由罗津比经由大连缩短路程1/3，有1 000多公里。如再从满洲的东北部佳木斯、牡丹江来看，经由图佳线，进出罗津港湾，则比经由大连足以减少一半路程，无怪乎日、伪满两国对罗津新港的重视。

1935年11月，雄基、罗津线10公里的铁路开通，罗津港初步完成。满铁招待了日、伪政府有关方面，在现地举行罗津开港式。当时我曾随着伪财政部大臣孙其昌前往参加，记得一道同行的，还有伪实业部大臣丁鉴修、满铁副总裁大村卓一。从伪新京出发一上车，就有满铁派出的人员一路随行专门做接待，大村副总裁也不时地出面周旋，同伪大臣们做短时间的闲谈，看样子好象很亲切。听得孙其昌曾自言自语说过：“大村这个人很和气，不象松冈洋右那一派似的。”可见他对于大村的印象是满够好的了。在满铁的款待下，丁鉴修、孙其昌两个伪大臣都感到非常满意。

大村卓一亲自主持开港仪式，他报告了筑港工程，谈到了新港远景，说什么罗津港的将来会象大连港一样在世界上闻名，看起来这个朝鲜北部的贫寒渔村，将一跃而成为东亚的关门。驻朝鲜军和关东军的代表，在他的贺词中着重地提到了罗津建港在军事上的重大意义，说是罗津港面对苏联的东部海岸，在保卫满洲的安全上，将起到日、满共同防卫的绝对作用。孙其昌在他的祝词中，说什么罗津港在政治上、军事上、在经济贸易上，在日、“满”两国的国策推行上，都有不可估计的价值，它是满洲东部的门户，日本商品对满洲的输入和满洲资源对日本的输出，将发挥它最大的吞吐能力。5月间，在京城缔结的日、

“满”税关协定，正是标志着罗津新港在日、“满”两国间担负着紧密的联系作用，他祝贺满铁在建港工程中取得的成功，祝贺罗津港一定会完成它的光荣使命。

第二天，满铁招待大家沿着海边公路乘汽车游览清津，然后由铁路回转图们。连日来，大村副总裁一直是做陪伴。

一个伪满外交官的回忆

王替夫

出使苏联

193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我们出任苏联赤塔领事馆的全班人马登上了通往哈尔滨的火车。我们一行共有12人，领事李垣带着太太、一个男孩和厨子，另外就是日籍副领事山田七郎、书记官邓福山、长谷川、雇员北岛清次和我，还有两个差役和司机洼田正治。

赤塔位于苏维埃共和国东南方，距离中苏边境线约千里，在西伯利亚地区可谓第二大城市，是一个前临河、背靠山的大城镇。

那时，赤塔还没有专门的对外办事机构，市政府设有外事科。那天到车站迎接我们的有市长（名字忘了）。外事科长叫拉根丁，此外还有赤塔军区的司令官、警察局的局长等。这些人由拉根丁负责向我们介绍，我负责把我们一行的人员介绍给他们。

到赤塔的头半年，就在忙乎些琐碎的事务中过去了，等到

领事馆正式办公已是转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了。为庆祝开馆，我们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宴会。

宴会的气氛是融洽的。但实际上，苏联与伪满的外交关系是勉强的。日军侵占东北之前，苏联在哈尔滨、绥芬河、满洲里3处设有领事馆。伪满洲国成立后，如果苏方对其不予承认，则3个领事馆就要被撤掉，这对苏联很不利。所以，苏联对伪满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处处设防，时时监视。就在我们领事馆门前，设有1个岗楼，上有1个探照灯，昼夜通明。在满苏边界线，大小不等的冲突几乎每天都有，有关这些冲突事件的抗议照会，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不是口头抗议，就是长篇大论的文字材料，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有时为某个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但大多都没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领事馆正式开馆后，设有领事办公室、副领事办公室、书记官办公室。具体分工是：领事总揽馆务、对外交涉，副领事负责馆务，日本书记官负责财务、电报、机密文件等，伪满书记官负责对外交涉，我负责馆内杂务。

“保护”中国侨民

领事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侨民”。然而，伪满领事馆却在保护侨民的幌子下，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侨民。

当年，在赤塔的中国侨民有上万人，南京政府在苏联莫斯科设有大使馆，但要入伪满国境，必须经过伪满领事馆办理入境手续。

伪满领事馆设立初期，每天都有不少侨民涌到这里，探寻家乡、亲人的情况，还有许多办签证回国手续的。

开始时，我们办事是很热心的，不久就有几个人同家人通信联系上了，这我们是动了不少脑筋的。比方说信件，苏方是

不准侨民往外寄的，我们就利用每次到满洲里购置食品时带去，因为外交官的专用车厢是不受检查的。

时间不长，我们就发现，经常到领事馆的许多人突然不见了。有时在街上遇到侨民，只是用眼睛盯着我们，却没有上来搭话的了，从他们忧伤的眼神中我们似乎发现了什么。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不少侨民回到东北便被抓进了监狱，有的被强迫移入他乡……

有一次到满洲里办事，当地的一位与我要好的官员悄悄对我说：你们赤塔那里签的证，虽然放他们进来了，你知道有几个是活着从这里走的？刚到时，日本人都是好吃好喝地款待，然后就逼着向苏联给了他们什么好处，有什么情报网，不交待就上酷刑，有的实在受不了就顺口胡说，正好上了日本人的圈套，许多人就这样丧了命。

记得我曾经给两个留欧的青年学生办理过入境签证手续。他们的老家都是南京人，在法国巴黎学了3年绘画后，想取道苏联回国。这两位清秀的年轻人都不过25岁，他们在我们领事馆早晨刚开门时就到了。一进来，他俩就恳求我能否快些为他们办理手续。游子归乡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于是笑着让他们先坐下休息休息。等我把签证交给他们时，俩人都激动地涌出了泪花。一再说“谢谢”，还相约等回到家一定给我们寄信。但一去就渺无音讯。听说，刚一到满洲里，就被日本人扣押了，说他们是苏联间谍。

侨民说：“满洲国领事馆去不得，去了不是蹲监狱就是送命！”

事实是，我们在领事馆给要回国的人刚办了签证手续，领事馆的日本人早已把这个人的情况用电报打到了满洲里的特务机关，他们人还没到，可罗网已经设好了，这样，他们怎么能

逃脱了厄运呢！

南京领事馆

早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便设立了驻苏赤塔领事馆。伪满驻赤塔领事馆的馆舍就设在它附近，但他们与我们来往甚少。原因很清楚，他们鄙视我们这个为日本人所左右的傀儡领事馆。

南京领事馆当时仅有3人。领事耿匡及其夫人、书记官李晓兰。与伪满领事馆不同，他们与苏联有着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弱国无外交。他们开馆以来没做什么事，不少中国侨民说南京领事馆的人是饭桶，连领事耿匡自己也讲：“我们大事办不了，小事不如侨民自己办的好。”南京领事馆的经费非常紧张，生活很艰难。交通工具只有1辆破马车。

在公开场合，苏联政府对这两个领事馆的态度是这样的：有什么大事小情请双方都到场，但分别接待，从不安排到一起坐。

收买梁秉堂

平时，南京领事馆的人见了我们都是远远避开，从不主动接触。山本副领事指示我们，主动同他们搭话，这样，不但可以了解那边的情况，也联络了感情。他还说，可以把这话递过去，如果他们愿意过来做事的话，我们可以给高薪水，都是加倍的。

领事耿匡中等个，四十多岁，他和书记官李晓兰很有民族气节，坚决反满，不理伪满洲国的人，更别提过来做事了。当时，他们有个差役叫梁秉堂的，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由于他和我们领事馆的勤务人员常见面，慢慢就熟了。我们的信差兼维俊曾多次让他到我们这，试探过他，让他回去做书记官和领事

的工作，还说，不管他俩是关里人还是关外的人，我们都愿意帮忙。但话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我们一直不死心，我们把从国内带来的牛肉、骆驼肉、马肉送去，这些东西在苏联是极少见的。可他们一直不搭茬。日本人的野心很大，想把他们都收买过来。后来，梁秉堂经常偷偷地过来坐坐，时间长了，便萌生了到这边干事的想法，我们一做工作，他便答应了。我同领事、副领事一说此事，他俩都同意。我先让梁填一个简历表，才得知，原来他是山东人，16岁同舅舅来哈尔滨给白俄人当学徒，后做买卖来到苏联，结识在南京领事馆工作的一个姓刘的同乡，后来，同乡年纪大了，已取道新疆回国，把他介绍到领事馆当了差。梁被收买后，正好那时我们的信差姜维俊回国了，他就暂时顶替了他。还给他增加了一倍工资，每月160卢布。

升任书记官

日本书记官长谷川没进入苏联国境时就因吐血住进了医院，在这一职上的伪满书记官邓福山，当年五十多岁，过去是哈尔滨吉林道尹公署翻译官，因为常同俄国人打交道，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但不会日语。他有抽大烟的嗜好，到了苏联后，日甚一日。自然引起日本人的不满，特别看到他同赤塔市当地的中国人交往过密，更是放心不下。于是，给新京的伪满外交部拍了一封电报，两个月后，他就被调回了国内。

这样一来，书记官一职就成了空缺。由于我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办事，因而，大得山本副领事的赏识，他极力向伪满洲国外交部举荐我，很快，新京外交部发来电函，任命我为书记官。一天，山本拿着一份电报，高兴地用日语向我道喜，我解是不解，他递给了我电报，这才明白自己已被提升为赤塔领事馆的书记官。来时，我们同是雇员身份的日本人北岛，一听这

消息，非让我请客不可。于是我出去买了一些酒、菜，同大家一起乐和了一场。

我提升后，主要负责对外交涉和翻译。与此同时，我们领事馆又在当地采用了3位苏联人，马车夫1名，下女2名。均由苏政府介绍。

警觉的苏联人

在赤塔3年多，我总的感觉是苏联方面是很警惕的，国家设防的也很严。尤其是对侨民和外交官员，使你感到，哪里都有他们的暗哨，无处不在，我们领事馆更是时时处在苏方监视之下。门前的岗楼除有大探照灯外，还设有电话、暗号铃等设备，我们一出使馆，无论乘车还是步行，均有人跟踪。一旦我们同当地人士接触，走后对方必受追问。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被外面的大好春光所吸引，便独自步出馆外，沿街走去。那天，我还随身带着一架能自动拍照的相机，打算遇到好景致时照两张。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了一座古俄罗斯建筑前，心里默默地赞叹着这个房屋的精致、典雅。手便支好了相机，把我和建筑一同收了进去。当我刚收拾好相机准备离去时，一位男士走到我跟前，有礼貌地说：“知道吗，您刚才照的是我们军人宿舍，是不允许的。”

我这才意识到面前的人是位便衣，同时也很惊讶，军人营区，这一点我倒没考虑到。

他看我疑惑不解的样子，说：“先跟我来一下。”

“怎么，要带我走？”我很是不满，抗议道：“我是满洲国的外交官，为什么要把我押走？”

他见我动火了，安慰道：“我只是检查一下相机，并没想限

制你的自由。”无奈，我只好跟着他去了。

到了军人区的一个办公室，他示意我坐下，然后把我的相机中的胶卷取出，把相机还给了我，说：“如果没有妨碍，明天会派人把底片给你送去，否则就留下了。”

第二天，一个士兵把胶卷给我送了回来，并道了歉。

新领事上任

李垣领事同山本副领事不和，之间总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两人又都互不相让，因此，矛盾越积越深。

李领事同山本副领事之间的磨擦，还不是因为公事，几乎都是私事，互相瞧不起对方的生活作风。

李领事说山本什么也不是，连话都说不清，性格也不开朗，不够做副领事的资格。他常对我说，他同山本唠不到一起。特别是山本从满洲里弄来个“妓女”后，他更是瞧不起他了，常在背后说，他要是来个好人家的姑娘也行，把那样的女人弄来，真是不要个脸，也亏他做得出来。李领事的作派和为人也很让山本不满，山本到伪满外交部说了不少李垣领事的坏话，不久，一张调令就来了。

李垣走时很是不痛快，苏联方面也没有人去送，回到新京后外交部也不太看重他。不得已，他辞了职回了老家——北京。

没多久，山本也调回了国内。伪满洲国驻满洲里外交办事处的副处长石田调来赤塔，成为赤塔领事馆的副领事，代替了山本的角色。

新上任的领事叫李义顺，是个日本通。在到伪满外交部前是龙江县县长。当年，他只有三十二三岁。初见面，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脸上那道深深的伤疤。据说，在他当县长时，由于同日本人交往甚密，得罪了省长程志远，后来日本人对程志

远有点疏远了，程省长以为是李义顺从中做的梗，便怀恨在心。正在这当口，省政府举行了一次宴会，日本人把李义顺也请来了，餐桌上程志远见李义顺得意忘形的样子，是越看越来气，火头上举起一支玻璃斧子撇向李义顺的脑袋，李义顺见势一偏头，砍在脸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去掉的伤疤。

后来，又增添了津田副领事，这是个脾气暴躁的典型日本人。没带家眷，孤身一人地生活。平时，他最大的嗜好是喝酒。

庆祝溥仪登基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的政体，从执政政治改为立宪君主制，溥仪摇身一变而成为伪皇帝，由一个所谓“全国人民推举就位”的伪政府首脑，一夜之间变成了世袭的君主。

在这之前，我们就从外交部得到了建国纪念章、溥仪像以及别的与庆典有关的东西。

溥仪登基那天，我们按着事先得到的钟点，在领事馆的悬关，把皇帝御影挂上，举行仪式，表示庆祝皇帝登基大典。

仪式是从9点钟开始的，领事馆的人员全都换上礼服，由领事带领，在御影前排列站好，由我当司仪，首先宣布开始，向御影三鞠躬，唱伪满国歌，领事读诏书，是我把木头盒的诏书递给李领事的，都戴着白手套，把绒线盒打开，宣读后又放了回去。

下午就是宴会了，苏方出席人员有赤塔市市长、副市长、外交科长、警察局长、地区的军区司令员等等。

间谍——外交官

赤塔3年，伪满领事馆暗中进行了大量间谍活动。当然，其中重要的勾当，日本人是不会允许中国人插手的。我所参与和了

解的大多是一般性间谍活动。

津田原系日本关东军陆军少佐（少校），是隐藏身份来领事馆搜集苏联军事情报的。在他的卧室里有高级照相机和显像扩大机，还有一架精致的望远镜，相机和望远镜他是随身带着的。差不多他每天都要出去几次，在赤塔市内外游玩、巡访。还经常带我们去郊外打猎或钓鱼，每次他都东张西望，不时地拍着照。对什么事他都怀有一颗好奇心，我们常看到他随身带一个小本子，不时地写上几笔，什么事很难轻易地被她放过。每当火车过后，车厢里装的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为此，背地里大家给他起个“猎狗”的外号。

193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津田副领事与我们一同去赤塔公园。那是赤塔市唯一的公园。虽说面积不太大，但在那地方可算是具有一定规模和相当吸引力了。公园里有一家雅致的餐厅和一个能同时容纳几十人的舞池。人们伴着优美的乐曲，跳一圈，坐下吃喝一顿，好不惬意。

我们几人在餐厅里找了一个空桌子，坐下后，来一位服务员，问我们要点什么，津田把手一挥说：“凡是你们这里好吃的都拿来。”我看到，他是故意放大嗓门说这句话的，说时还不时地用眼角瞟着邻桌的一位苏联现役军官。军官是个俄罗斯族人，黄头发，蓝眼睛，身材高大魁梧。他正一人坐在那里，要的一个菜已经吃的差不多了。看我们好酒、好菜冒着热气端上来，忍不住望几眼。这一切，都被津田看到眼里，等到菜快上齐了，他暗示了一下大石书记官，意思是让他把军官叫过来。大石会意，走到苏联军官身边，用俄语说：“伙计，过来凑个热闹吧！”早已有心的军官便顺势凑了过来。

津田给他斟了一杯葡萄酒，说：“来，为了我们的相识，干一杯。”

看他喝下去了，大石大为高兴，赞赏道：“好酒量”，接着又问：“是不是再来点白酒啊？”

军官点了点头。

大石忙叫服务员拿来白酒杯，趁势斟满一杯。

这时，军官已有几分醉意了，但又抗不过那一桌子香甜饭菜的诱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

这场面很快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人们都发觉有点不对劲。一个苏联现役军官和日本人坐在一起喝酒，很是乍眼。不久，军官就不行了，说话已连不成句子，手脚也不听指挥了……

津田站了起来，拍着苏联军官的肩膀说：“走吧！”

醉泥般的军官已失去知觉，陷入昏睡之中。于是，津田让大家帮忙，把军官架到我们来时开的汽车上。到了领事馆，军官由司机洼田背着进了津田的寝室。

第2天，我见到洼田，随便问了一句：“那个军人什么时候走的？”

洼田神秘地看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句“大约3点”就匆匆离去。

原来，那位军官喝的人事不省后，军人身份证和手枪全让津田收缴，并在深夜一二点钟时把他用车拉到郊外的山坡上推下去了。

一天，津田找到我说：“王书记官，跟苏联政府联系一下，在我们领事馆院内给打口井。”我听了很不解，我们是有自来水的，为什么还要打井。后来才明白，在军事方面，这样可以探一下地质，看到了什么程度才有岩石。

我同拉根丁联系过后，苏方很快打发来四五个民工，他们换着班挖，一天收工后，我随便去看看，发现津田正用几个小瓶把不同层的土，分别放入瓶中。后来，挖深了，他就让大石

下去，津田仔细看看，那神情象是个地质专家似的。

1934年十月革命节，赤塔市政府举行隆重的阅兵式，邀请在赤塔的所有外交使节参加。

临行前，津田除了领事外给每人都分派了差事，每人发了记事本和铅笔头。他告诉我们把小记事本和小铅笔头放在大衣兜里，参观检阅时，手插在兜里，把应当记的暗暗记下来，回来后整理好交给他。记得当时交给我的任务记机械化部队，具体讲就是左边兜记坦克，右边兜记载兵车，一辆记一道，交给书记官大石的任务是记炮兵，什么类型的，数量多少。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搜集苏军情报，其中重要和急需的电传回去，一般的交信差专程送到伪满外交部驻满洲里外交办事处。

“满洲里会议”^①前后

1936年冬，我领事馆接到伪满外交部通知，说蒙古方面的代表将要通过赤塔参加满洲里会议，让我们到车站迎接。蒙古方面的3名代表，是乘苏联国际列车到达赤塔的，火车进站时间是早晨6点多钟。领事带着我们到车站做了应酬。他们在车站停留的时间大约有十几分钟。

在此期间，日本关东军通过伪满外交部授命我领事馆，派人监督苏联由西部通往远东的军事运输车辆，我领事馆派日本司机洼田，每天由早到晚到河边钓鱼进行观察。为了掩护其行动，我们每个星期天也都到河边去钓鱼。

粉饰侵略

苏联政府让售中东铁路之后，苏籍铁路员工全部撤回国内。

^① 即“满蒙国境会议”。

这时，伪满外交部指示我们调查苏籍人员回国后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况。其真实意图在于说明在日本侵略下的伪满洲国比社会主义苏联好，以此来粉饰他们的侵略政策。

我独自一人执行这项任务，先到莫斯科，求助于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可呆了3天，什么情况也没有弄清楚。

而后，我又登上了到贝加尔湖地区伊尔库斯科的火车。最后，我又到了伊丽古斯克和乌兰乌德。一路上，我与所遇到的回国苏籍人员进行了一些交谈。

回来后，我拟就了调查报告上报伪满外交部，大意是：苏籍人员在满洲国生活得很好，回到苏联后，生活很艰苦，尽管都是俄国人，但穿戴、神色和当地人不一样……云云。实际上，这些粉饰侵略的言词，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累死也得不到主子的信任

记得那是到赤塔的第2年，也就是1934年夏七、八月份时，李领事的太太回国了，他寂寞无聊，想到离赤塔不远的“达拉松”温泉疗养地放松一下。正好那时馆内也没什么大事，是能走得开的，于是，李领事向苏联驻赤塔的外交办事处提出了外出疗养的申请，很快就下来了准行的批示。

李领事很高兴，接到介绍信后就打好行装匆匆上路了。

谁知，李领事的举动引起了津田副领事的猜疑，好象李领事是肩负着什么使命走的，他不好追回和亲自跟去，怎么办呢？津田很是不放心，在李领事走的第2天就把我叫了去，“王书记官，近来怎么样，看你好象很疲乏。”

听了这话倒把我弄懵了。因为那时我妻子、孩子刚到赤塔，生活顺心如意，还没有令我太费神的，我知道这话里好象蕴含着什么东西，又不能直说，只好用探寻的口气问：“副领事找我

有事吗？”

大概津田看出了我有些紧张，连忙改换面孔，微笑着说：“王书记官，别误会，我只是看你有些劳累，打算让你休息休息。”

这时，我已明白几分，但还是装着不懂，傻呼呼地看着他。津田接着说：“李领事不是已经走了吗，你也玩几天去吧。”

然后补充道：“达拉松是个好地方，一般是去不了的，这可是个机会，李领事自己很寂寞，你去了可以陪一陪他。”

当时，我对疗养之事毫无兴趣，也没考虑过，但经津田一说，也只好应承下来了。在送我出来时，津田副领事说：“到了那，看看李领事生活的怎样，嗯！”

没办法，我开始回去收拾行装，并与苏方联系，说李领事去疗养，我有事同他联系。我清楚地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日本人让干什么是不能违背的，处在我们的位置上，日本人注意你，苏联人不放心你。

很快，苏联驻赤塔外事办批准了我赴达拉松疗养地的申请，我带着妻子、孩子一同坐上了火车，大石太太到车站送我们，这是过去没有的，我知道她来的用意，是津田派来监视我们，看是否真的走了。

在达拉松车站下车到疗养地还有二十多公里的汽车路，到时，天快黑了。李领事看到我们，显出很不解的样子：“你怎么有空来了？”

我回答：“津田副领事考虑你自己在这寂寞，让我来陪陪你。”

李领事听后说：“这里的温泉不错，你可以洗洗。”然后帮我安排好了住处。

达拉松确实是个好地方，苏方能到这里来的都是干部和先进工作者。

我们在达拉松呆了一天两夜，很无聊，全家就回来了。临走时，李领事送我很远，我看他脸色阴郁，就关心地询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告诉我：“这里的伙食很合我的胃口，想再呆几天。”

回到赤塔，人们好是惊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真没意思。”

一到家，津田副领事就来问候，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于是就随便向他介绍了那里的自然状况，副领事以为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又问：“都是些什么人在那疗养啊，有军人、军营吗？”

我说：“没看到，人们都穿着统一的疗养服，看不出什么军人和机关干部。”

应付完津田副领事，我很疲惫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突然感到房屋的一切都和走时两样了，明显得很，家被搜查了。

李领事也有同样的遭遇，这是他回来后同我闲唠时说出来的。当时我们都深有感触。李领事道：“王书记官，你看到没有，给日本人干事，就是累死也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

在大连伪满外交办事处

一般来说，外交人员在外驻扎的时间不能超过3年。

驻边境的外交办事处人员，一般很少再调回国内，而都派到国外去，原因是怕被外国人收买，回来当间谍。那时，驻满洲里外交办事处的书记官黄通，南方人，二十多岁，同办事处一个打字员结了婚，呆了几年后，被日本人调到德国汉堡去了。驻绥芬河办事处的俄文翻译李芳林呆了两三年后，被调到驻波兰总领事馆了。我在赤塔呆了3年半，可仍没有让我回来的意思，心里很着急。我同妻子商量，打算深造，到日本留学，于是向津田副领事提了出来。半年后，伪满外交部批准了我的请

求，我带着妻子、儿女回到了国内，那是1936年夏天。

1936年9月，我由赤塔领事馆转到了大连市伪满外交办事处，处长叫陈道，副处长是日本人村上，我和一个叫张栋的做书记官，还有一个雇员陈原阴，仆役刘洪金，另外是个白俄。

办事处的任务是专对东西方出入伪满国境的外国人办理签证手续，此外我们有时也以外交官的身份出席关东州日本各机关的活动和大小宴会，当时的大连是属于日本关东州的附属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和市长都是日本人。

那时，我们有个固定的“业务”，就是每周一、三、五到码头迎、送日本的伤兵，也有骨灰盒。有来的，也有走的，我们办事处的任务是接待一下。

记得在大连近郊，有个叫“夏家河子”的地方，住着个白俄将军——阿达曼·谢苗诺夫，是个少将军衔。在伪满洲国的属地做反苏的工作，他网罗一些哈萨克人，在大连成立了“反苏骑兵团”，他任团长，约有百十个人。平时操练、习武，再不就摩拳擦掌，嚷嚷着要打回苏联去，恢复沙俄的统治。

记得有一次，阿达曼·谢苗诺夫派人送来一个请柬，是邀请我们办事处的人参加他们的一个什么“纪念日”，正好陈道处长不在家，张栋书记官非让我去不可，说我会俄语，去是最合适的，这样，我就作为伪满洲国驻大连办事处代表参加了。活动是在少将的官邸举行的，是个很古的二节楼，表面看上去，已经历了几番沧桑之变了。

那天，参加的人还有日本驻大连特务机关的、水上警察署的等。除了日本的官方代表外，民间的还有“三井”、“三菱”、“满铁”的代表。

会议是由白俄少将主持的，他的骑兵团成员都穿着沙俄时代的军服站在台上。少将又进行了一番鼓动宣传，如何与日本

协同，进行军事训练，又怎么打回俄国去等。

又到转年春天时，少将又举行了一次阅兵式，邀请了二百多日满人员参加。

还有一次，我们接待了一个来自上海、拿着法国护照的女人，在这之前，就已接到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的指令，遇到这样的人立即报告。她是来办查证手续的，我们告诉了日本特务，她自然没有逃脱掉。听说，她是个苏联特务。

出使德国

我在大连工作了1年半，当我第2次出国到欧洲任命时已是1938年底了。

8月15日，伪满洲国国务院发表人事变动的辞令，消息首先在大连的报纸上发表了。大意是：现在满洲国驻大连外交办事处的书记官王替夫，少年英俊，会4门外语，在任赤塔领事馆书记官时成绩显著，此次被派往德国，任驻德国公使馆书记官，成为满洲国驻欧洲的首批使者。同时任命公布的还有：公使吕宜文、参事官江原纲一、书记官伊吹辛隆、主事笠井、刘茂才。

8月末，我们一家来到新京伪满外交部。

大桥次长一见我就说：“回来了！”我一再表示感谢，承蒙提拔，有机会到国外去工作等等。

大桥次长又说：“还记得咱们头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吧？”他说：“那时我就说过，你有当大使的希望，虽说现在还不是大使，但进了公使馆，就是大使的接班人了。”说完哈哈大笑。

伪满外交部发给我们每人1.5万元旅费、1.2万元制装费和一些家属的津贴费。

1938年9月，我们将要赴德的全班人马准备上路了。

新京火车站，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李绍庚

及各部大臣都来送行，还有日本大使馆的、外交部各科的科长、日本商界的代表等都赶到了车站。我的父母也特意从哈尔滨赶来了。

沿途见闻

1938年9月上旬，我们一行及其家属，乘亚细亚号专列，由新京启程。

在大连作了短暂的逗留后，我们坐上日本的“吉林丸”客船取道神户来到大阪。

第2天，大阪市政府为我们派专车游览市容，一位小巧的日本姑娘做导游，沿途热心地为我们讲解。

然后，我们又坐车到了日本在华参战的伤兵医院。那是个由几栋平房组成的整洁的建筑，原先好象是个兵营。当时我想，这可真是个大天的讽刺，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而我们却来慰问……带队的日本人向伤兵们介绍说，满洲国首次派到欧洲的使者到这里来看你们了，伤重的仍躺在那里哼哼，伤轻的就欠起身子，向我们点头，还有的伸出手来同我们握手。吕宜文公使以伪满公使的名义对在中国负伤的军人们作了广播讲话，大意是说：你们是为皇国的重托，不惜千万里之遥到了中国，为国效劳，却身负重伤，在此我希望你们静心养伤，早日复原，重返战场。

说实话，我当时听了吕公使的话心里好不自在，因为我毕竟是个中国人。

9月18日下午两点，我们一行在大阪登上了远航船1.4万吨“靖国丸”号，继续我们的航程。

船从大阪起航后，首次停泊的港口是上海。船刚一靠岸，我们不少人都涌到甲板上了。

又踏上了中国国土，心里不自觉地溢出一一种亲切感。

船还没靠岸时，日本人就有话在先，到了上海，不打招呼不能下船，因为上海反满的情绪很高，暗杀也很厉害，下了船说不定会回不来呢。

途经伦敦，我们又横渡大西洋，直赴德国汉堡港，日本驻汉堡的总领事馆人员都到码头迎接我们，稍作休息，当晚便坐上火车向我们这次旅行的终点——柏林进发。

车到柏林

1938年11月中旬，我们一行终于到达了这次长途旅行的终点站——德国首都柏林。

火车刚刚在柏林站停稳。只见戒备森严的月台上，已站满了前来迎接我们的人，他们中有德国政府外交部典礼司司长、日本驻德大使以及日本各会社驻柏林的人员。

由于公使馆没有修缮好，日本驻德大使馆便同德国外交部联系，暂时安排我们住进了柏林一家最大的，也是最豪华的旅馆，馆名忘了，只记得它坐落在柏林市的繁华地段。

至今回忆起在柏林6年的外交生涯，总觉得真正处理事务性活动太少了。因为我们到德国4个月后才正式开馆办公，那是1939年3月，而那时的纳粹德国，把主要精力都用于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1月份，我们正式迁入公使馆。

馆址位于柏林市中心地带的茶园附近，那是一座结构别致的西式小洋楼，共3层，院内被松柏、鲜花环绕，清新、淡雅，置身在其中，有一种爽心悦目之感。

洋楼的楼下全部是办公室，3楼上除公使用的外，其余大厅作餐厅、客厅等用。

公使馆还在当地招聘了一部分德国人，有两名女打字员，一名信差，一个司机，再加上两个女仆。

馆舍修缮好后，正赶上伪满洲国的建国节，公使决定，要好好地庆贺一番。

为此，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先同德国外交部联系，请他们拟定将要出席的人员名单，然后请他们负责帮着送请柬。再就是筹备我们将要举行的大型鸡尾酒会。

“建国节”那天，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及各部部长、柏林市长及地方、军队的官员都来表示祝贺。

各国公使馆、大使馆的外交官也来祝贺了，庆祝活动直到深夜才结束。

同时，我们也接到不少贺信、贺电，大多是欧洲一些刚建交的国家发来的。

向希特勒递交国书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要求递交国书，举行正式的建交仪式。于是照会德国外交部。

1939年2月末的一天，我们得到德国方面的通知说第2天上午10点在总统府正式举行仪式。

那一天，我们全馆的人都起得很早，做好了一切准备。

接着事先约好的时间，公使吕宜文、参事官江原纲一及我和1位日本书记官等4人身着大礼服来到公使馆。

上午9时45分，1辆德国外交部的迎接汽车停在公使馆门口。

公使、参事官在1位德国外交部人员陪同下乘坐1车，我，日本书记官和另1名德国迎接员坐着我们公使馆的车，很快就到了德国总统府门前。

德国外交部典礼司司长、总统府掌礼官等出来迎接我们。首先把我们4个人让到客厅，稍作休息。

德国总统府是1座水泥面高大建筑，威严、雄壮，门前的台阶很高，门口分立站着两位身穿青呢子军装、腰束白色武装带的护卫军。我们进门时，他俩举枪向我们敬礼。

约半个小时后，希特勒在外交部长的陪同下，由典礼司司长作引导来到大客厅。我们都起立敬礼，迎接这位当时叱咤欧洲、风云世界的大独裁者。

希特勒在正座前站好，德国外交部典礼司司长向他介绍说：“满洲国的外交公使一行4人来谒见阁下。”说完，他退到一旁。我们4人上前一步，行了一个鞠躬礼。我把国书捧给公使，公使双手接过，用汉语念道：“‘大满洲帝国政府致德意志共和国希特勒总统阁下的国书’，特命敝国全权公使吕宜文为驻贵国柏林的全权公使。”

吕宜文公使念完后，便把国书用双手捧给希特勒，希特勒又交给典礼司司长。

然后，希特勒在外交部长陪同下，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离开了。

这时，侍从端上酒来，留下的外交部长等德方人士举杯向我们祝贺。

中午11点30分左右，希特勒在总统府餐厅设午餐招待我们。

大家围坐在1个大长条餐桌两旁，希特勒坐在最上方，他的左边是吕公使，右边是江原参事官。紧挨着公使的是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

这是我第1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希特勒，不禁抬头望了他几眼。我看到，在希特勒的眼神中，有一种寻常人所没有的

东西，那么令人着魔——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我看到我们公使吕宜文也在偷眼瞧着希特勒。

用的是西餐，四菜一汤再加酒。吃饭时，希特勒很关心地对我们说：“满洲国土地肥沃，是世界上大豆的盛产地，虽然质量赶不上美国，但由于气候适宜，产量是相当高的。知道吗，如果我们德国也能那样，就不是现在这个样了，工业、经济都会有空前的发展。”他接着说：“我们德国油料产品缺乏，同满洲国建交后，很希望你们在这方面给予大大支持。”希特勒顿了一下，环视了大家一眼，加了一句：“假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也会同样做的。”

最后，希特勒站起身祝酒：“祝德满两国建交、友好、通商、文化交流，共同协作，并祝贵国皇帝陛下万岁。”

吕宜文公使作了简短的答词，大意是敝公使今后一定会对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努力。

我们又回到客厅，喝了咖啡，又闲唠了一会就回来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礼节性的拜访、回拜。当初，由于德国首先承认了伪满洲国，西欧各国迫于德国的势力，也相继承认了伪满洲国。捷克、丹麦、挪威、芬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先后和伪满洲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伪满洲国无力再派使节出任，于是就让我们驻德国大使馆兼理这些国家的事宜。

我们给驻柏林的各外国大使馆、公使馆发了信函，同时，也陆续收到一些贺信，日本驻德的会社等也都前来表示祝贺，我们也到各个公使馆、大使馆拜访。

争夺东北大豆

我国东北的特产——大豆，是植物中出油率最高的，在我

国科学不发达的当时，只把大豆用来榨油或做豆腐，剩下的就被视为废料了。而在较先进的欧洲则不然，购去的大豆除少部分做人造奶油而外，大部分用于化学工业方面，用大豆可制出百种以上的产品，如呢绒绸缎、造革，工业上用的各种压缩盒、箱壳等模型，数不胜数。

德国一位名叫斯特劳斯的科学家，在1张大豆宣传画上，把1粒大豆画在当中并由此引出百种射线，每个射线都标明它的用处，因而把它称为“钻石”是当之无愧的。

1930年，德国农业科学家们为了在德国培种大豆，费尽心机。因德国土壤不适宜，他们用船将中国的土运往德国南部气温较好的地区试种，结果只长秧而不结角，失败了。

为了争夺我国的东北大豆，德国在1936年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开始互换驻两国首都的贸易代表，先搞通商，后换使节。到1938年两国公使馆正式开设后，德国更加紧了对我国大豆的争夺。所购去的大豆除了少部分做人奶造油外，大部分用于化学工业方面了。

当时丹麦政府之所以迫切承认伪满洲国，也是为了买中国的大豆。而实际上大豆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当伪满洲国和丹麦的大豆贸易正在双方考虑中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随之，海陆交通封锁，这场贸易也随之瓦解。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伪满驻华北大使馆琐记

韩董洲口述 功良记录

日本侵占东北，扶植溥仪傀儡政权，组成伪“满洲帝国”以后。进一步实施其蚕食鲸吞政策，大举入关，又用老一套的手法，先后扶植以王克敏、王揖唐等为首的北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以汪精卫为头子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并促使其合流，以便双管齐下地榨取中国的人力和资源，企图实现其吞并全中国囊括东南亚的迷梦。

从1941年1月到1943年4月，我充任伪满洲国驻华北大使馆的秘书长。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多少还能回忆出一些片断，现在简述如下：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伪满跟着就在北京中南海卅字廊东首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块白地黑字的“满洲国通商代表部”的牌子。这个机构虽然以“通商”为名，实际上就是大使馆的性质。因为华北伪组织还称不上一个国家，在外交惯例上是无法派遣使节、成立大使馆的。然而，即使在通商方面，也只是日本从关外运进一些粮食之类而已，谈不上国与国之间的通商贸易。

这个机关的头子的职衔叫做“代表”，公然由日本人充任。我开始任职时的代表叫中根不羁雄，他是个中日混血儿，母亲是中国人。所以从小就会说中国话，对中国的风俗习惯很熟悉，生活腐化，经常打牌、酗酒、逛妓院。工作人员最初不过十几

个人，后来增加到二十多人。但其中只有六七个人是中国人，其余的都是日本人，他们分别掌握政务、秘书、庶务等方面的实际工作。

在政府工作方面，完全是由日本人干，只有一个中国人，而且还是台湾籍的。他们在干些什么勾当，是秘而不宣的，连我这个当秘书长的人也不知道，也不便过问。有一个名义上搞社会经济工作的，名叫井上，除了对外联络外，经常做调查报告和通讯联系的工作。那个台湾籍的中国人名叫黄清涂，年纪很轻，日本话说得同日本人一样，中国话说得也很流利，常常更换便衣外出，行动很神秘，看来不外是搞情报调查工作。

在秘书工作方面，主要是交际应酬，送往迎来。其次是办理签发护照，当时叫做查证。这项工作由两个人负责：一个专门办理由苏联流亡到东北的白俄的出关入关手续，一个专门办理东北人的出关入关手续。第三是办理学务，设法联系并安置“留学生”——到关内来上学的东北青年。这就需要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北京市政府联系。在这个部门中工作的大部分是中国人，我这个秘书长实际只是这个部门的秘书长。

1940年3月30日，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号称“还都”，汪精卫粉墨登场，自任代理主席，表面上统一了沦陷区的伪政权，成为一个“主权国”了。当然，日本首先予以承认，伪满也紧跟着派遣大使，在南京成立“满洲国驻华大使馆”，并且把北京的“满洲国通商代表部”也换成了同样的牌子。按常理说：绝没有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设立两个使馆的，伪满在北京的外交机构只能隶属于南京伪大使馆。但实际上是各行其是，各自与当地的伪政权打交道，各自直接受伪满外交部管辖和指挥。伪大使到北京时，华北大使馆也把他作为贵宾来招待。

北京伪满大使馆成立后，原通商代表部的日本籍代表撤回

了；但换回来的大使馆负责人竟仍然是日本人，名叫佐枝荣一，当时称为参事官。他出身于广岛高等师范学院，已六十多岁，不外裔，专致力于他的本位工作。

编制上有了增添，增加了政务处，处长（内部叫做理事官）是一个名叫孙错的中国人，下面有几个专门办理政务的日本人。从职权上说，这个“处”应当由孙来领导，但实际上他有职无权，只是一个牌位而已，我的秘书长的名义也改称为“秘书科长”。

既然是大使馆，当然就得有武官。这个武官倒是中国人，由伪满军政部派来的，他并不到大使馆来办公，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办公，只有在宴会时，他在坐着插有伪满五色国旗的使馆汽车到使馆来充主人，或者来参加外地的各种外交活动。

此外，大使馆里居然还有一个管理司法的单位，由两个日本人负责，是伪满司法部任命的。办公地址在北新桥附近，实际上，他们单干特务工作。

1943年，在我脱离这个伪满外交机构以后，这个大使馆就由中南海迁到东交民巷。

1945年日本投降时的最后一位大使是个日本人，原任安东市市长。他讲得一口纯粹的北京话，好排场，讲阔气，交游广泛，挥金如土。蒋政权接收北京后，他更大肆活动，同接收大员打得十分火热，最后由蒋政权派人护送他回国。

伪满驻南京大使馆武官的见闻

佟新

一、伪满、汪伪大使馆互派武官的经过

我于1943年曾充伪满驻南京汪伪政府的大使馆少将武官，伪满、汪伪双方互派大使馆武官的经过是，1939年汪精卫声称国民政府还都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在南京成立伪政府，那时伪满就派王庆璋为通商代表驻在上海。1940年汪伪政府派外交部长徐良、陆军部长鲍文樾为访满亲善使节的正副使，到了伪满首都新京同伪满发生了外交上的联系，同年伪满政府又派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外务局长官韦焕章为亲善使节到南京答礼，构成了“日满华亲善提携”的格局。汪伪承认了伪满洲国，决定双方互派大使。伪满就派了吕荣寰为“满洲国”大使，驻在南京。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德国和意大利同时承认了汪伪政权，并派出大使（德）和公使（意）以及武官驻在南京，增强了轴心国家的“防共体势”。不久，日本又发动太平洋上的侵略战争，英、美等国也对日本宣战，于是汪伪外交方面成为了世界法西斯及其附属者们聚集的一个中心。为加强伪满大使馆机构，日本驻华总军和关东军协商，伪满、汪伪也应与“轴心国家”取一致行动，互派武官，因此伪满的日本军事顾问部指使伪军事部，派遣一名驻华大使馆武官，驻在南京。但是，伪满、汪伪同是在日本军方面控制之下，并且双方从来概不直接发生任何军事上的联系，所以军事部没有交代我以具体的任务。

武官处的组织只有武官、辅佐官及属官各1名，每月只具报武官行事表1份备查，概没有别的行动。我以伪满驻华大使馆机构内成员的资格，于1943年7月末赴南京着任。

二、我所看到的汪精卫

我于8月5日到达南京，按大使馆的行事预定，次日带同辅佐官西村喜寿少校，由汪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引导到主席官邸去谒见汪精卫。汪在接见后与我谈话，他问我伪满建军的情形和什么叫‘国兵法’？我回答说：“满洲国蒙友邦日本的援助，实现了共同防卫，使国家治安确立，国本得以奠定，军队统率大权归于皇帝，依照日满共同防卫的精神，日本关东军驻在满洲国，派有军事顾问部作军事上全盘的指导。军事部大臣对军令、军政有辅弼之责，军权统一于中央，随国家法制的确立，军队整备，废除以往的募兵制，实行义务兵制度，国民不仅履行兵役，且为选择优良壮丁，加以军事的训练教育，退役还乡后，即在地方上服务，遂行政府的各项法令，以收军民一体的实效，所以叫‘国兵法’”。这是我根据伪满高级顾问花谷正在当伪满实施“国兵法”和颁布防卫令时对我们所讲的话，它露骨的表现出日寇奴役东北人民，搜罗炮灰，用以巩固其殖民统治的实质，且公开地把满洲国作为日本的仆从国家和一切不能自主的傀儡政权，作“冠冕堂皇”的虚伪宣传。汪伪去年曾访问了满洲国，伪满的情况他知道得很清楚。这种“军”当然瞒不住他，所以听我说完之后，微微地笑了一笑，有意“赞扬”地说：“满洲国是有一些很好而又独特的办法，去年我到满洲国看到国务院内有总务厅的设置，这种组织就很适合满洲自己国家的情况，与一般不同的一个例子。”这话语中是意有所指的，却说得很含蓄，以后又说了几句应酬话，我就告辞了。我回到家中，寻思汪的

谈话在含蓄中又非常尖锐，每句话中都有意思在内，事情他是看得很清楚，可是我不了解他由重庆跑出来走“和运”，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现在南京政府不是已经同满洲国差不多了吗？一个曾从事辛亥革命的人物，难道自己愿意同满洲国站在一条线上吗？他可为的是什么呢？是“别有抱负”想出了好办法，暂为周旋呢？还是不幸陷在日本的泥坑里，拔不出腿来了呢？左想右想我看不透他们是怎么回事？事隔不久，我在汪伪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鲍文樾的家客厅里看到汪精卫在“还都”不久写的一个屏条上题的诗：“满院有苔未扫出，一庭芳秽有叶除，炉边爆得花生来，闻与儿童说与子虚”。当时在坐的都是旧时东北的同事，大家谈论说，上面的儿童系指的是小鬼子日本，老汪想办的事他们都要干扰，还得费唇舌敷衍他们，在日本刺刀下的处境很难，不屈从是不行的。当时我心里想，听他们自己方面人的谈话，老汪恐怕是已经陷在泥坑里，无法拔出腿来了吧！以后我同鲍文樾两人闲谈，问他怎么同汪精卫搞在一起去了呢？他说：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就住在天津，汪精卫到了上海之后，由陆大同学杨毓珣约他到上海与汪会见，他们就搞在一起了，直到现在。至于究竟为什么汪精卫由重庆跑出来，同蒋介石又是怎么个关系，他也摸不清楚，不过知道汪到河内时只有曾仲鸣等几个人，后来曾仲鸣被刺，汪到了上海陆续由重庆来了不少人。可是随汪跑出来的人又有跑回去的，如高崇武、陶希圣等到了上海之后，又由香港回到重庆，说他们把汪与日本定的和约带到重庆报告了蒋介石，究竟蒋汪之间到底怎么回事，也不清楚知道。不过据传说，汪由重庆出来搞“和运”，最初蒋介石对他尚不怎么反对，以后汪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对日谈和的经过，大概说，在南京陷落后，德国公使陶德曼出头为中日战争调停，其条件是恢复“七·七”事变当时的情况，中

国方面应禁止排日，参加防共，日本方面限期撤兵等，……当时蒋介石说过“这尚不算亡国条件，可以接受做具体商量”。以后陶德曼没有做回复，中日双方又继续打起来。汪说“和谈”不是他个人的主张，现在进行的和平活动也不出这个范围，怎么蒋介石又不认帐了呢？自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以后，蒋介石很恨老汪，说他把秘密给泄露了，重庆和南京就对立起来。我又问他，现在内外这种纷乱的局势，汪主席的“和平救国”主张可怎么实现呢？他回答说：“一般人评论老汪，说他有领袖欲，可是这种内外关系交错起来支配着他，使其内心上产生很大的矛盾，现在的政府是七拼八凑的，找出这么一帮人，各人都作自己的打算，多数人是跟着整天鬼混，谁也想不出好办法，走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吧！”以上是我们两个人略去伪装和客套形迹作朋友关系的私人谈话，由此使我看到汪精卫的为人。以后，我也有一次直接听到汪精卫“和平救国”的谬论。那是在当年秋季南京军官学校学生毕业典礼上，汪对学生训话，大致同以前发表的一样，他着重说：“和平则中日两国共荣，抗战则中国必亡。而本人‘和平救国’的主张是依据广田三原则，为拯斯民于水火，并无损于中国的主权，独有蒋介石多方阻挠而给中国人民加剧灾难，背理弃信，国人共同愤慨，在重庆方面的人，很多同意南京方面的主张，不久必能相继归来，相共完成和平运动……”。事后他们私下谈论：“老汪的讲话使人听着肉麻”。同时他的内部中人有好多不愿意听他骂蒋介石，足见当时南京与重庆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我在南京只有两次接触到汪精卫的言论，至于他对伪满的关系，使我想到1942年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资格访问伪满。当他由伪满回到南京的时候，乘坐火车经过沈阳，那时我在伪满第一军管区充参谋长。受军事部命令，以对国家元首的礼节迎

接他，鸣礼炮21响，在车站上吹奏中华民国的国乐。当时，我感觉奇怪，按国家的体制，一国元首出国，何必用行政院长身份呢？这样他见溥仪就不能用平等礼节相待，现在可又以元首礼节相送，反而显得对他的元首身份不尊重，岂不是对他这个元首有些亵渎呢？以后汪精卫在伪满又做了一次广播演说。他说：“过去我们是同胞，现在我们又是同胞，将来我们还是同胞”。这几句话在伪满轰动一时，在日本人方面大加赞赏说他说得巧妙。东北的人私下议论着，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是居心断送东北，现在汪精卫承认了“满洲国”之后，还把中国拉在“满洲国”的一条线上，还来东北认同胞，这岂不是他们又葬送了全中国呢？汪精卫这几句“漂亮话”在东北并没有得到好评。我到南京，听伪满大使馆人说，上海某电影公司拍制一部名叫“西施”的古装片，用老汪说话的语调，把“过去我们是同胞，现在我们又是同胞，将来我们还是同胞”的话整个儿地给引用上了，汪精卫看了这影片，很是生气地说：“这岂不是嘲笑我吗？”于是这部影片当时就被禁演了，足见汪精卫卑躬折节降身屈从访问伪满，在哪方面都是大不得人心的。

三、伪满南京驻华大使馆的罪恶活动

日本常驻汪伪政府的机关是：日本驻华总军司令部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来执行它的军事占领政策。伪满大使馆是日本的仆从机关，打着“日满华亲善提携”的旗号，给日本占领当局服务。在南京陷落后，日方所树植的维新政府时期，伪满就派出驻上海的通商的代表，利用特务和汉奸替日本盗运物资。以后汪伪承认了伪满洲国是国，设置了外交使节，通商代表王庆璋改为驻上海的总领事，“换汤不换药”，仍然给日寇盗运和收购军用物资。他是直接给日本方面办事的，概不经过伪满政府

和驻南京大使馆。

汪伪政府也是在日寇的军事控制之下，特别是宁沪地区为日本的军事占领区，它的陆、海军在该地任意搜刮、掠夺，概不理睬正常的经济通商关系。伪满是日本军的附随者，尽全力以援助它的侵略战争。例如1944年10月，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携同日本关东军和驻满海军府的参谋各1名，到南京与日本驻华总军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协商决定，由伪满运来鸦片10万两到上海与汪伪方面交换生活物资棉布等项，供给日本陆海军方面的军事需用。实际上是日本陆海军方面为掠夺物资而分肥，海上和大陆它们各有侵略占领的势力范围，由伪满搜刮来鸦片毒物，陆海军两方面各派来参谋1名来监视其交易，双方因分肥不均时起磨擦，古海还得以中间人的身份居中调停。这种尖锐矛盾，更暴露了日本军方的丑恶面目。伪满大使馆只是为之奔走，招待供应，扮演仆从的角色而已。

伪满大使吕荣寰平时也不能主持外交上的事物，只是以傀儡身份登场。遇有典礼时，由他率领着参事官、武官等“衣冠楚楚”地参加外交行列，或出席宴会以“敦睦两国的交流”，这是唯一的使命。另外一种使命，是给汪伪方面以“示范”的作用，充当忠实走狗，服侍主人，对汪伪方面发生影响。由我所看到的一事足资证明。在1944年夏季，伪满的原军事部高级顾问由山西日军方面特务机关长、调赴缅甸作战军的师团长花谷正中将，路经南京，因伪满的关系，特别关心对汉奸们的控制，来拜访吕荣寰。我听到他对吕荣寰说：“大使您对日满华亲善负重大使命，请在与汪政府各要人谈话时告诉他们，日本军为完遂圣战责任重大，中国应和日本互相亲善提携，现在一切都服从于军事，从各方面加以援助，不要认为中国和日本是同等的国家，自己想怎么做，就随便地做。如果日本总军加以干涉，就

说压制他们，这样就可能失去两方面的善邻友好关系，不利于大东亚战争，影响大局。”花谷这话系有所指而发，当他到南京时，正值日本军方和汪伪政府发生磨擦，是日本军方面因补充战事的消耗，极力压榨沦陷区的物资。对于生活必需品实行征发，在传示汪伪上海当局要查收当地民间仓库的前夜，被汪伪方面泄露了消息。有关工商业界，在一夜之间秘密把物资运出境外，分散隐藏起来，使日本有关方面“摸了空”。仅查收了很小一部份，这与他们调查掌握的数目相差悬殊，日本总军以破坏军事行动为名，把汪伪方面当事者有数名予以枪决，这即为盛传一时的“后胡案件”。日军参谋大佐辻正信特把周佛海传到司令部，严加申斥，周当时并未申辩，回到财政部后，即求人向总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话并大发牢骚。他说：“狡兔未死，走狗先烹，将来谁敢再给日本方面办事，再说给日本军办这类事，要是得不到好处，谁肯去白效劳？何况现在又杀人了，这样严苛，我算办不动了，请总军另委别人吧！”周佛海这番话暴露出，他们这帮人充当出卖中国人民利益帮凶的实质，并且居然敢要挟日本有关方面，不怕触犯日本人的虎须，也暴露出汪伪与日本的矛盾。冈村也感到它的军事势力已日没西山，对这般汉奸控驭失灵，只好对周佛海安抚了事。花谷知道这场风波，闹得彼此矛盾更深，他让吕荣寰告诉汪伪方面，应以伪满作模范，学着怎么样做一个好走狗，要向汪伪传授伪满经验，这是他的另一个使命。

伪满大使馆是日本大使馆的附属，由公使三浦武夫主持事务，参事官张荫棠只是个“招牌”，与汪伪方面接头办事——跑腿学舌，但是自己却不能做什么主张。此外，有两名参事官，日本方面叫办涉外的事，一个是日本人俊藤某，汪伪到河内时，他曾为之奔走联络，是个日本的“浪人”，和汪伪方面接上了头，

所以日本人在伪满大使馆给他挂个名，利用他与各方面熟悉，在汪伪官吏内部进行私人方面的政治活动。还有一个做特务工作的，朝鲜人朴正胤，他给日军在海外南洋方面搜集情报，除报领旅费之外，不在馆内办事，行动是很诡密的。总之一切都在日本操纵之下活动。其他科长、秘书、主事等办事的馆员只办些参观、访问，和出入国境等日常事务，伪满汪伪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外交事务，不过是要弄一些傀儡登场表演而已。

四、我所看到的汪精卫的军队

汪精卫由重庆出来，以“反共和平”为号召，搞什么“和平运动”，破坏抗战，卖国投敌，受日本人的保护。到了南京，他自己宣称，此次还都系为“救国救民”，不组建自己派系的军队，相信尔后重庆方面必有人响应他的号召，相率归来，使“国统重光”。因此南京方面好些人说：“蒋介石在重庆抗战，汪精卫在南京谈和，他们俩人虽然矛盾很深，然而目标是一致的，所谓异趋同归是也。”果然以后投到汪精卫旗帜之下的军队，都同蒋介石方面不断联系，日本人很清楚这一点，便也顺水推舟想用谋略来瓦解中国抗战体势，汪伪的“和平区”就是这种局面。

汪在河内因曾仲鸣被刺，感到自己专恃日本人的保护是不行的，所以他把戴笠军统方面的李士群拉拢过来，随他到了上海，做为保镖者。同时，又有日本军帮助他，在沪宁各地与蒋介石的特工人员进行斗争，总算扼止了蒋方的特务人员的攻击，一时当上国民政府主席。而李士群也作了江苏省长，并把他的特工人员组织成汪伪的军事统计调查局，与日军合作搞特务活动。

南京陷落之初，成立伪政权，以梁鸿志为首组织维新政府，与日本合作。当时南京附近有任援道的地方军，系地主、恶霸等地方势力与日本协力组织的武装力量，及汪精卫到了南京任命任援道为第一警备军司令，兼任海军部长，就地筹餉搜括地方。江南地区连接上海都是由任担任警备，也就是他的势力范围，给日寇作守门犬，破坏抗战的力量。

苏北一带蒋介石撤退后，有残留下来的李长江等人的地方军队，他们抢占地盘称霸一方，兼正赶上日本人也是“鞭长莫及”故尔李长江得以喘息，在苏北继续扰害人民，专门破坏在敌后抗战的新四军的行动。汪伪政府成立后，因这里是新四军抗战活跃的地区，也是日本人感到最棘手的地区，故汪伪设置了苏北行营，汪逆自兼行营主任，实际是在日本军控制之下，进行破坏抗战活动。于是将李长江等人势力纳入，都参加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李仍为虎作伥，在苏北给日军扫荡抗日人民武装力量作前驱。

由上海至沿海一带的江西地区为经济枢纽地带。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伪军和地方武装，汪伪财政部周佛海为给日本军掠夺资源，设有伪税警团，担任巡逻、警备、监察物资入境出境等，为日寇效鹰犬之劳。

汪逆在日本保护之下，拱居南京，他自己也感到人民对他仇恨很深，为自卫起见，于是也编练了几个师的警卫军，并设立军官学校，培养初级干部，作为他的基干部队。武器、装备仰仗日本方面供给，并声扬说，这是将来建立新军的基础。但是，日方对汪并不放心，南京政府还是直接置于日本军控制之下，在南京城内、外各地都驻有日本军，他的警卫军不过是给主席官邸和国民政府守门。各城门口都由日军把守，不时地戒严和检查。城外出了警戒线，还有新四军的游击队不时地进行

活动。在1944年春季，汪伪接到地方报告，城乡附近发现了一股游击队，他就命令警卫军派一部队迎击。该警卫军约有一连被游击队诱至湖沼地带，全部缴械放回。汪逆认为太不够面子，气得他把部下大骂一顿了事。

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南京、武汉陷落后，在长江的沿海口岸，统归日军占领。皖赣南部及浙江西南部日军势力尚未能深入；在长江以北，津浦、陇海铁路沿线，作“总”线占领，以江南、苏北、徐海、武汉，构成了四个据点，与上海及广州、福建沿海一带相呼应，日本称为华中地区，交付与汪伪给他作守门犬，以防止抗日军的入侵。汪伪到南京后，以安福系的杨揆一，由参谋长转为武汉绥靖主任，以后杨病故，汪逆派他的陆军部长叶蓬接充。实际上，这一地区是日军直接占领，并没有汪伪的军队，主要是利用汉奸军队直接控制人民，为虎作伥，以作占领区的掩护。

在长江以北，由新乡到南阳的平汉铁路线尚有一段未沦陷于敌手。鄂东、豫南及河北平原新乡一带，除蒋军的卫立煌战区外，鲁豫一带的八路军尚坚持拒守，使日军未能进犯，蒋介石把何柱国、于学忠等旧东北军，留置在豫西、皖北，拒而不战，保存实力，并同汪伪保持联系，互不侵犯。日军在此地主要是为了保持它和其它占领区的背后联络线，故也未作扩大范围的占领，一时双方呈现胶着相持的状态。在河南省北部陇海路沿线及河北新乡地区，蒋介石把旧西北军孙良诚、孙殿英、庞炳勋等部队留置在这个地方，汪伪到了南京以后，这些部队逐次地参加了和平运动，其目的在于占领地盘，妨碍八路军的抗战行动。汪伪政府任孙良诚为河南省长，并收容了他们的军队，命其军队与日军配合共同保持占领区，以扼拒新四军的抗日行动。同时在和平、反共的旗号下，还不断地与蒋介石加强联系。

此外有由华北伪政权转移到汪伪方面来的胡毓坤的绥靖军，日本为便于统领，命令他驻任归德一带，其任务也是“反共”。绥靖军与孙良诚等军队是一丘之貉，所差别的是，它们不是由重庆方面反叛过来的军队。

徐州为日本华北驻屯军所属部队占领，因此由当地汉奸郝鹏举成立临时政权。汪伪到了南京把徐海及淮河地区划为淮海省制内而设治在徐州。在这里，蒋介石撤退后并没有残留的部队，所以也没有汪伪方面的“和平军”。这个伪省长给谁？一时间追逐者大有人在，投归汪逆的汉奸郝鹏举，走了夫人路线，运动陈璧君，经汪的任命当上了淮海省长。我在伪满大使馆听说，郝与陈约到任后即奉上贿款，不想事隔经年，并未如期交付，陈璧君急不可耐，亲到徐州坐索，方才到手。汪伪的卑污贪婪，也不亚于蒋的四大家族。

但是，苏鲁边区人民的抗日气势高昂，在青、兖一带，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军给日军以强大的打击。汪逆于是又想利用汉奸去残害人民，诱致于学忠部下荣子恒投降（他是伪河北省长荣臻的儿子），归附后补充枪械，编成独立师，开赴山东，协同日本军对抗日军进行“扫荡”。后在广州一带被人民抗日军包围击毙，伪军也被歼，人民的威势使日伪军丧胆。

总之，汪伪的“和平区”主要在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蒋汪两方面各不相犯，汪逆专收容由重庆方面来参加的军队。有人说，日本人想利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瓦解抗战，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军队，转化为“皇协军”。

五、日薄崦嵫的日寇侵华军事

我于1943年8月至1944年12月这一期间，驻在南京伪满大使馆。做为武官是随日本方面“亦步亦趋”的。在伪满时，我

们一切都得受关东军的指导，来到南京仍得同日本驻华总军保持联系。我的辅佐官西村喜寿是日本人，凡事由他给联络，到时候由我出场。记得1944年秋季，日军对重庆方面发动攻势，先攻克郑州，打通了平汉线，尔后陷长沙、取桂林，俘虏重庆方面的军长方某，把蒋介石压缩在四川、云南那一个角落里去了。南京方面猜想，日本此次大规模攻势，不久必下重庆。战局又有变化，不想日军进攻到此就中止了。我的辅佐官西村，请我到日本总军祝贺此次战役的胜利，总军的参谋副长兼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落合少将接待我。我说：“总军此次的胜利，重庆指日可下，俾此大陆作战可竟全功”。他笑了一笑说：“重庆并不是难攻不落，驱逐蒋介石出重庆，垂手可得，但是不能解决大陆的作战，所以总军就攻到这个地方，暂时停止”。我请他进一步说明，他回答我：“在中国大陆作战，由满洲到现在战斗第一线，背后联络线有相当的长度。况且，西北、华北、华中的战场，也相当的广阔，现在还是处处遇到抵抗。强大的敌人并不在蒋介石方面，在西北方面就占用了相当的兵力，华北和汪先生的和平区虽然同日本军协力，但是还阻止不了游击队的‘扰害’，日本军要是不以兵力支援，后方就不能巩固。山东、河北一带还是很麻烦的，攻陷重庆怎能够解决大陆的作战呢？再就太平洋战争全盘形势来说，中国大陆只能算作局部作战，兵力应如何分布也应考虑，所以今后的作战还得看看各方面的形势。”由日酋落合谈话中即可看出，它的侵华战争，已成为“强弩之末”了。日军这次攻势停顿后不久，积极侵华的总军司令官畑俊六调回国内，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网村宁次充其后任。这时受军部反对、组阁未成的宇垣一成大将来华到了上海，据日本方面传出消息，他是与重庆方面来接洽，试探议和的。我听伪满大使馆的日本人讲：“宇垣此行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他

们谈论：中国方面对议和没有诚意，在战争开始，蒋介石只望日本能退出华北，而限于满洲国。在近卫内阁时，中国要求退还东北，取消满洲国，这就使日本方面不能承认的了，可是到了现在，中国越吃口胃越高，说非恢复甲午战以前的状况不可，这样的“狂妄”，迫使日本人非打下去不可。我们听他们说的这片话，就感到日本已成强弩之末，日本军到了这时，士气非常低落，就连主战的人们也都失去了胜利的信心。日酋冈村为给内部人打气，召集军部及日本大使馆的人员，并请伪满大使馆的人也来参加，开了个联欢会，由作战科长辻正信大佐讲演他在南洋作战的情况。他说，现在太平洋战争局势虽没有进展，然而日军能克服困难，美国海空军优势并不可怕，他们的军队只凭武器锐利，人的战斗能力，绝对不能跟日本军相比，反而中国军虽然武器不精，人的战斗要素武勇耐劳，意气旺盛，除日本军外，欧洲、美洲各国，俱是敌不过的。对中国军不可轻侮，希望大家对于这点要多留意。他虽然就战争局势鼓励大家，但就连最高指挥机关的中级干部也都意气消沉，感到无望。日薄崦嵫到了穷途末路了。

六、伪满汉奸在内地的罪恶活动

日本军国主义者，一贯执行田中奏折所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政策。日寇南次郎居然倡言“满鲜一如”视东北如朝鲜是它所征服的奴隶。在伪满服务的汉奸，甘心为虎作伥，卖国求荣，造成滔天罪行。我所看到由伪满转到汪伪政府，给日寇作爪牙的有：

汪伪南京要港司令海军中将尹祚乾。他是伪满江防舰队司令官，1940年伪满取消海军，统归关东军统辖，海军的江防舰队改为陆军江上军，尹祚乾任司令官，但日本海军方面对他总

不忘情。汪伪成立南京政府，长沙沿岸及上海归日本海军占领的势力范围，于是尹祚乾被日本海军方面把他推荐给汪政府，委以南京要港司令，主要是监察长江各岸口抗日军的活动及物资的运行，为日寇作番犬，并帮凶敌人对中国物资的掠夺。

广州警备副司令陆军中将郑洸薰。他的籍贯不明，自报广东籍，有人说他是台湾人，为日寇多年豢养系士官学校毕业，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时，曾给日军作间谍。1932年日本关东军第三科长原田雄吉，推荐他到伪满军政部任少校秘书，又送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41年原田雄吉充汪伪军事最高顾问，又把他推荐到汪伪军事委员会任上校科长。认陈璧君为同乡，由汪逆精卫任命他为广州警备副司令，实际是日本宪兵的特务，残害抗战人民，大事搜刮。1943年汪伪又任命他为驻伪满中将大使馆武官，他借机把搜刮的赃款汇往日本，携带日本籍的妻子，移居东京，然后又辞职回到广州，依然在日军驱使下活动。

武汉绥靖公署清乡局长王遇甲。他是湖北人，前清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辛亥革命时任陆军第二镇协统（旅长）率北军攻下龟山。光复后，居北京，不敢出头露面。“九·一八”后投入伪满，曾充延吉地区司令官、宪兵总团司令官、军官学校校长等职，于1943年辞职。1944年日本眼见战争形势不利，为加强镇压占领区内人民的抗战行动，把王遇甲推荐到武汉绥靖公署，充清乡局长给日本人作刽子手，屠杀爱国人士。

总之，日寇利用这些驯服的汉奸，作为它侵略中国的工具。以上三人是伪满汉奸中的典型。此外各地供日寇驱使者也不在少数。

伪满与外蒙“满洲里会议”简况

金声整理

哈尔哈庙事件（即诺门罕战争）后，哈尔哈河沿岸哨所之间小冲突不断发生，日益加剧。为了解决二百年前就已留下的边界和领土问题，伪满洲国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召开会议，重新划定边境线的建议。但是，当时伪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并没有被中国政府承认，仍坚决认为此“二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伪满和外蒙双方，也未承认对方的国际地位，于是由日本出头请苏联从中搭桥，通过日苏间数次交涉，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地点定在满洲里，简称满洲里会议。

伪满洲国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是：

首席代表：凌升，伪兴安北省省长。

代表：斋藤正锐（日本海拉尔特务机关长中佐）、乌尔金（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官少将）、神吉正一（伪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长）。

随员：石田谋、正珠尔扎布、华林太、玉闻精一、猪口三藏。

服务员：宫本。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是：

首席代表：桑布（外交部副部长）、丹巴（军团长）、德格索尔（政务委员）、其木特道尔吉等。

蒙古代表团住地设在乘坐来的专车里。

伪满代表团都设在满洲里头道街苏联领事馆斜对面民房里。

会址设在铁道南的一所平房里。

满洲里会议共开了三次，三次会议都因为节外生枝不欢而散，边界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种下了恶因。

第一次满洲里会议是在1935年6月1日召开的，会议上，伪满洲国代表主张：诺门罕方面，双方的边界线应在哈拉哈河一线上，以哈拉哈河主流为两国的国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主张：哈拉哈河是蒙古的领河，双方边界线通过哈拉哈河东侧和北侧。会议的焦点是哈尔哈庙一带地区的归属问题，双方反复坚持，重复二百年前喀尔喀东臣汗部和呼伦贝尔新巴虎两个部族的意见，而且都拿出了古旧的地图和文据做为理由。

就在会议争论期间，关东军做了手脚，向哈拉哈河派出军事测绘队。在胡鲁斯台河边，被蒙军抓走两名，其余跑回。为此，关东军指使伪满洲国代表，在7月4日的会议上，向蒙方代表提出：惩处肇事者，承认满洲国代表常驻蒙古领内，如果蒙方不答应上述要求，“满洲国”（实际是关东军）将迫使塔木察格布拉克——斯梅一线以东的蒙古军队撤走。

蒙方代表没有理睬日满这个以军事进行要挟的讹诈，于8月26日回国。

第二次满洲里会议，是在苏联驻日大使就关东军指使伪满洲国代表在会上要挟蒙方代表一事，向日本广田外相提出抗议并发表了声明。在日本向苏联表示歉意后，于同年10月2日召开。但这次会议只举行了四次。由于双方重复第一次会议各自的观点，于11月25日再次休会。

1936年2月20日，苏联和蒙古修订了为期十年《苏蒙互助

条约》，3月29日，日军突袭蒙古境内的达乌兰战斗遭到失败后，日军又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交涉，于1936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三次满洲里会议。

第三次满洲里会议，伪满洲代表团成员有了更动，成员名单如下：

首席代表：凌升。

代表：矢野征记（“满洲国”外交部调查司长）、乌尔金、菊竹稻穗（兴安局次长）。

随员：石田谋、正珠尔扎布、获原长一郎、额尔钦巴雅尔、哈达、饭盛某。

这次代表团成员里，没有日本现役军人，关东军感到前次会议派了日本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参加，暴露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真相，没有得到好处，反而被蒙方代表看不起。但虽然明里没有军人，背后确是满洲里特务机关长樱井健三少佐进行操纵，而会上，则是日人矢野独断专行。会议期间关东军参谋次长矶谷廉介少将和司令部第四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专门到满洲里听取会议情况。

第三次会议正在争议期间，11月25日传来日本和德国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这个针对苏联和蒙古的日德同盟，刺激了苏联政府，于是，在《日德防共协定》发表后，蒙方代表立即回国。

“满洲里会议”，由于新的恶因而彻底破裂了。

（摘自《满洲里文史资料》第四辑）

忆“满洲里会议”

正珠尔扎布

满（伪满洲国）蒙（外蒙）国境会议，因为是在满洲里举行的，所以通常叫做“满洲里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划定“满”蒙两国接壤地区哈拉哈河一带不明确的国境线而举行的会议。

一、日方对会议的真正企图

伪满洲国成立后，在哈拉哈河，特别是哈拉哈庙，也称将军庙附近，日蒙双方国境监视哨之间，不断发生小冲突。这种冲突愈演愈烈，愈来愈频繁，以至发展到双方出动军队互相袭击的程度。而日本帝国主义向来抱着相机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野心。由于他们用尽各种方法都得不到对方真正详细的各种情报，因而，想借举行会议机会，窥探一下对方之情形。日本人常说外蒙是一个谜，他们怀疑蒙古的独立，认为它是苏联的附属国，想试探一下蒙古对日满的态度和看法；苏蒙关系如何，能不能拉拢它。日本方面想通过满洲里会议来揭开这个谜底，所谓举行会议，划定国境线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二、交涉召开会议的经过

“满洲国”如何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召开会议的提议，一开始就成了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满蒙双方没有相互承认对方的国际地位，因而不能直接交涉。“满洲国”方面向苏联试探，

请苏方在其中斡旋。但苏联由于不承认“满洲国”，拒绝从中斡旋。最后，日本只得出头请苏联帮忙，苏联这才答应从中斡旋，通过日、苏间的多次交涉，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当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电答应开会时，伪满外交部政务司长神吉正一说：“终于答应了，看看外蒙到底怎么样。”

伪满方面会议代表团的组成情况，最初的代表团成员和随员名单如下：

首席代表：凌升（伪兴安北省长）。

代表：斋藤正锐（日本海拉尔特务机关长、中佐）、沃尔金（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官、少佐）、神吉正一（“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长）。

随员：石田谋（“满洲国”外交部驻满洲里副领事、会谈、俄语、担任会议记录）、正珠尔扎布（“满洲国”蒙政部事务官担任翻译、联络）、华林太（兴安北省秘书官）、玉闻精一（“满洲国”外交部雇员、伊犁人，会日、德、俄、法、英语）、猪口三藏（日本浪人，曾潜入乌兰巴托被捕入狱后逃海拉尔，会俄、蒙、汉语）。

服务员：官本（兴安北省警备军雇员，会谈、蒙、俄语、专招待外蒙代表团）。

伪满洲国代表团是在满洲里头道街苏联领事馆斜对面民房设立了“满洲国外交部代表团部”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名单为：

首席代表：桑布（外交部次长）。

代表：丹巴（军团长）、德格索尔（政务委员）。

随员：其木特道尔吉（传书使，担任会议记录）。

随员：某（蒙语翻译）。

其他随员姓名忘记了。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住在乘坐来的专用列车里。车内服务人员都是蒙古人和苏联人，其中以苏联人为多。

他们到达满洲里车站时，受到了满洲国代表团的欢迎，彼此寒暄了一番。他们全部穿着西服，态度潇洒，出乎我的预料，尤其是正式开会那一天，他们全部穿上民族服装，表现出民族独立自豪的态度，令人钦佩和羡慕。

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监视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来以前，伪满洲国代表同当地日本特务机关櫻井隼三少佐和国境警察队内田队长商定监视和保护蒙方代表的措施。特派一名叫太原的巡官（日本人，会蒙、俄语）专门随从保护（监视）。另派一名特务在车站附近潜伏，每天汇报他们的活动情况，如购买什么东西，走那条街道，几个人，对店员说了些什么话等等。借此推测蒙古人民共和国缺少什么物资、经济情况、蒙方想知道满洲国什么情况。

四、会议的表面情况

满蒙边界会议在1934年6月开始至8月下旬，历时约三个月，会场设在铁道南的一所平房里，这次会议由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而宣告无定期休会。

1935年1月，在满洲里二道街白俄中学复会。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员没有变动。伪满洲国代表团名单如下：

首席代表：凌升。

代 表：矢野征记（满洲国外交部调查司长）、乌尔金、菊竹稻穗（曾任兴安局次长，所谓蒙古通）。

随 员：石田谋、正珠尔扎布、获原长一郎、额尔钦巴

雅尔（满洲国兴安北省警备军官，担任会议记录）、哈达（兴安北省秘书官）、饭盛某（伪外交部属官）。

这次代表团里没有军人，因为日本关东军感到第一次会议派了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参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面前暴露了满洲国的傀儡真相，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叫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瞧不起。明里虽然没有军人，背后都是满洲里特务机关长樱井兼三少佐进行操纵。

第二次会议后半截，矢野独断专行，把持一切，因而代表团内部意见不统一。菊竹稻穗和正珠尔扎布以“妥协”为名被开除代表团，还因通蒙嫌疑把哈达也开除了。

会议期间，关东军军部派矶谷廉介参谋副长、第四课长河边虎四郎到满洲里听取会议情况，他们对会议的成功与否毫不在意，河边曾问我：“怎样？外蒙对你们有同族感情吗？”我说：“没有，他们瞧不起我们。”

会议期间相互开了几次招待会。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在餐车上招待我们，用苏式酒席；满洲国方面是在东亚旅馆举行的，用日本式酒席；此外还特别准备了肉类。

有一次，日本报纸刊登了满洲国招待会的情况，内容有：宴会非常融洽。桑布代表饮酒，脖红耳赤等语。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看报后，提出了抗议。认为满方违犯协议，没有取得蒙方同意而登报，并且使用“脖红耳赤”带污辱性的词句。满方为此向蒙方道歉。

此外，还举行过野游、打猎、看电影、看哥萨克舞蹈等。

会议上蒙方代表发言后，由蒙方译员翻成汉语；满方代表发言后，满方译员翻成哈拉哈语。满方主要发言人是凌升，蒙古主要发言人是桑布。其他代表间有发言。

会议的焦点是哈拉哈庙一带地区的归属问题。双方在前后两次会议上都是反复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第二次会议上，蒙方拿出一幅古色苍然的哈拉哈河一带的略图作为争辩的依据，但满方对那个地图连看都不看，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样，第二次会议也和第一次会议一样毫无进展。所谓满蒙国境划定会议自1934年6月至1935年3月下旬（中间休会五个月）遂以毫无结果而告终。

每次会议记录满方代表团都向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外交部、日本外务省、海拉尔、满洲里特务机关报送一份。

五、关于“哈达通蒙嫌疑”

有一次招待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观看电影，第二天桑布代表给凌升代表一张纸片，说：“这是昨夜晚黑暗中，你们代表团某人偷偷递交我这张纸片。我们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到此地开会的，不是为了搜集你们情报来的，这种行为对我是一种污辱。我们不需要这个。”态度非常严肃。凌升说：“我们查究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张纸片上用蒙文写着关于驻海拉尔和满洲里以及国境线上的日伪军的一些情况。

以后，伪满警务厅、日本宪兵队共同进行调查。结果认定是哈达笔迹，但哈达坚决不承认，由于警务厅长板水梧郎的庇护（板水对哈达特有感情）并在不扩大事态的情况下，把哈达开除代表团才了事。

六、日、满从满洲里会议得到的东西

满洲里会议以无结果而告终，但日满方面却有一些心得：

1. 蒙方代表里没有苏联人，而感到好象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他们却常到苏联领事馆联系。因此，还是认为外蒙不是

完全独立的国家，苏联是他的后台老板，苏、蒙关系如同日、满关系一样。

2. 蒙方代表对满洲国代表没有表示什么好的印象，无法拉拢。

3. 后来在新京（长春）日本料理八千代馆里武藤章（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被处绞刑）和神吉正一谈话，当时我在场。神吉说：“满洲里会议虽无结果，但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满洲国也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了，怎么说也是一个国际会议啊。”

还有一次武藤问我：“你看外蒙人怎样？”我说：“他们有一种自豪感，认为自己是独立国家，瞧不起我们。公事公办。一概不说闲话。”武藤说：“那是从苏联学来的，互相监督，心里有话也不敢说啊。”

七、其他活动

会议期间，我主要担任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联络事务，如开会日期、时间、送报等事，休会时，常去访问闲谈（别的任何人是都不许随便访问的），闲谈中不涉及会议、国情、民族等问题。有一次，我对桑布代表说：“我们内外蒙古民族结成一国多好啊。”桑布代表听后，站起来说：“休息休息吧。”径自走向卧室去了。

以上所写的内容不充实，也不系统。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了，很多事情想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不少地方与事实有出入，请知情人给予纠正补充。

（摘自《满洲里文史资料》第四辑）

哈尔滨日伪警察 有关外事方面的种种罪行

肖炳龙 王习文

伪外事警察的情报活动

哈尔滨自从成为中东铁路枢纽站之后，就是一个具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国际大都市。哈尔滨市居住有各国籍或无国籍（主要为白俄）的众多人口，语言、风俗、生活方式因国籍不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差异。据伪哈尔滨警察厅在1934年的调查统计：哈尔滨户口总数为99 233户、人口总数为482 452人。除中国人外，人口较多的有日本人14 773人、朝鲜人7 245人、苏联人25 521人、无国籍者32 073，其他国籍人2 501人，这五者相加总人数为82 122人。

除多国人口居住哈尔滨外，当时的哈尔滨还有一个特点。当时凡在伪满洲国设立过领事馆的国家，几乎都把自己的领事馆设在哈尔滨。在哈尔滨设立过领事馆的国家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荷兰、丹麦、葡萄牙、比利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在这些国家中，有日本的同盟国，如德国、意大利等国；也有日本的敌对国，如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国。这些国家都以哈尔滨为基地，以哈尔滨为中心展开角逐，从事外交战、情报战和间谍战，使哈尔滨成为当时远东国际情报战的中心之一。

日本在1918年前后，就建立了哈尔滨特务机关——日本关

东军情报部的前身。伪满时期，哈尔滨地区的所谓外事警察主要接受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指挥。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成立后，外事警察的活动由伪保安局统揽，在指挥系统方面同时直接受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第二课指挥。伪外事警察机构中绝少有中国人，外事警察活动，特别是涉及到情报间谍方面的机密，绝对不准中国人伪警察插手，一些特别外事间谍机构中都是清一色的日本人。据1939年在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任职的日本人警佐进藤静雄供称，他在外事科任职时，科内主要负责人多由日本人担任，特别是科、股两级官职均由日本人把持。当时的外事科长为日本人羽切正平理事官，外事股长为日本人泽田，执照股长竹内。科内有日本人平川、黑岩、河西、相泽、高桥、大藪等。除这些日本人警察外，有会日语的两名白俄警察担任翻译，另有10余名白俄警察充任内勤和外勤。

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表面上是管理哈尔滨的外籍居住人口，办理户籍、居住、迁徙、旅行、出入境等事项；骨子里，哈尔滨地区的伪外事警察，主要是对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及馆内工作人员进行监视和侦察，对其它各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馆也进行间谍活动。另外，各国在哈尔滨设立的商务机构、社会宗教团体也是外事警察间谍对象，他们在这些机构中进行特务活动，在外国侨民中网罗密侦、特务腿子，驱使这些人在侨民中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报，并通过这些人对外国侨民实行监控。

伪外事警察常装扮成绅士阔佬或平民百姓，活动于社会各个角落，与各种人打交道，将听到的或看到的事都可作为情报资料加以汇总归纳，上报伪警务机构。在这些情报中，甚至可以获得有某种重大价值的情报。1939年4月间，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日本人警察大藪武雄从哈尔滨的犹太人的传闻中，得

到了有关苏联与德国正在从事秘密谈判的消息，反映了当时苏联对德国外交的动向和态度。如果这一情报可靠，将影响日本的对苏、对德外交政策，日本必须对苏德两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大藪武雄获得这一情报后，甚感吃惊。当时一面倒的国际舆论是德国即将对苏联开战，各国报刊亦连篇累牍登载苏德关系紧张的消息，丝毫没有两国关系松动的迹象。自1935年3月，德军公然开进莱茵区，3月11日，吞并奥地利。1939年3月15日，德军又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在与英、法的莫斯科谈判破裂后，为打破英、法等国怂恿德国继续把侵略矛头东指进攻苏联的阴谋，德国为便于集中力量于西线对付英、法，避免东西两线作战，遂同苏联秘密接触，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于是，苏德两国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谈判。此情况与公开的舆论报道相去甚远。获得情报的大藪武雄虽感到作为社会传闻，没有什么根据，但又觉得这一情报关系重大，预感苏德谈判一旦成为事实，必对日本外交产生重大影响，遂立即向外事科通报了这一信息。当时的外事科长川手与九郎认为这条消息极为重要，并觉得犹太人的情报网比较可靠，有一定的根据，马上决定向上级警务机关报告。

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迅即将此事以书面形式上报伪滨江省警务厅，伪警务厅也上报了伪满警察最高机构警务司。但伪警务厅与伪警务司都把此事当作例行公务，未作为重要情报予以重视。结果1939年8月间，苏联与德国之间突然公布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外交产生极大影响。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使日、德、意三国同盟的交涉被打断，日本外务省对此重大事件的突然发生，不知所措，使日本外交陷入窘境。日本军部和政府都为之茫然，日本的平沼内阁甚至发表了欧洲情

势“复杂离奇”，找不出应付方针的这一国际政治史上空前笨拙的声明而全体辞职。

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还建立了固定的谍报联络网，设置秘密情报点，物色所需人物定期提供情报，这样的人即是密侦，外事科掌握的密侦，具体人数无法统计，仅为伪哈尔滨警察厅南岗警察署特务系主任兼外事系主任掌握的密侦数就有40余名。这些密侦一般都为上层人物、社会名流，有相当范围的社会关系。其中有白俄旧贵族、白俄高级将领。这些人交际广，消息来源自然较多。比如，马尔斯商行经理捷克曼、马迭尔饭店经理基依明、南岗秋林洋行职员瓦金。有些人甚至本人即在日伪警察特机构中任职，比如秋林洋行职员中村，实际上是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嘱托。

为了从英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内获得情报，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日本人警察相泽雅一警尉，利用白俄警察，以英国驻哈尔滨领事馆为对象进行谍报活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收买了英国领事馆内一名中国杂役，指示这名杂役窃取英国领事馆内的机密文件。该杂役乘一次英国领事外出之机，盗出一本电报密码，经过摄影后，又送回原处。这事发生在1940年初，拍摄密码本时，除相泽警尉和白俄警察外，还有外事股长中根通助、河西警佐在场。盗拍的密码本是商业用的，并无政治军事价值，但也可从中搜集商业情报，对当时日本了解英国商业活动，有一定的价值。据当时外事科外事股日本人警佐进藤静雄讲，虽然盗拍的电报密码是商用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但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是唯一的東西。因此，由于盗拍成功，相泽还获得了伪满政府的警察功劳奖赏。

1940年1月，日本、伪满、苏联、蒙古在哈尔滨举行有关诺门罕事件善后处理会议，即所谓在蒙古和伪满划定边界会议。

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是诺门罕事件时的朱可夫元帅麾下的兵团参谋长鲍格达诺夫少将。日方了解到鲍格达诺夫的哥哥谢廖沙住在哈尔滨郊外，希望与阔别30年的弟弟会面。为策反鲍格达诺夫首席代表流亡伪满洲国，日本人组织特务工作班并用尽了一切手段。谢廖沙追赶已踏上归途的苏联代表团一行直到满洲里，结果日本人唆使谢廖沙出面的策反活动以失败告终。

1940年8月，苏、蒙、日、伪满四方在哈尔滨召开所谓边界谈判会议。根据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的命令，伪滨江省警务厅指示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警务人员全力以赴对苏蒙代表进行监视、策反和防谍活动。由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长古谷负责对苏联代表下榻的哈尔滨大和旅馆的警戒，以及对苏蒙代表的尾随。为防止苏蒙与会者从事谍报活动，古谷指挥外事科在苏、美、英、法、德等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前设置监视哨所，调查各国领事馆进出人员，侦察、甄别谍报嫌疑者，每天汇集各领事馆前监视哨所的工作日报，于次日晨集中报告外事科负责人，再上报伪滨江省警务厅。另外，会议各方代表团举行联欢时，外事科派出人员，以警戒的名义监视苏蒙代表团成员。外事科日本人警察相泽雅一还利用南岗军官街凡达基雅舞场的白俄舞女做密侦，化装潜入苏联外交人员下榻的大和旅馆，以女招待的身份接近苏联代表，乘机从其窝内窃出秘密文件，翻拍成照片后，放回了原处。

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设有无线电台，昼夜监听苏联远东各重要城市的广播电台播音。如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城市的电台播音，重点监听苏联有关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新闻广播。归纳总结一段时期内，政界、军界要人活动状况，人事变动情况，从中捕捉有关谍报资料。

利用白俄迫害白俄

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大量的俄国人涌入哈尔滨；俄国十月革命后，又有大批俄国流亡者遁入哈尔滨，使得哈尔滨的俄侨激增。其中一部分加入了苏联国籍而成为苏联公民；还有不少人不满意苏维埃政权，未加入苏联国籍，甚至也未取得其它国籍，这些人被称为无国籍的“白俄”或“白党”。“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境内居住有7万余俄国侨民，约有半数集中在哈尔滨。在哈尔滨的白俄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流亡东北的帝俄政府的官员、贵族、白军、商贾和中东铁路技职人员等，这些人之中的头面人物有白军高级军官谢苗诺夫、巴克谢耶夫、弗拉谢夫斯基、高尔察克反动政府的大臣米哈依洛夫等，他们素怀仇苏反共之心。流入东北后，秘密组建反动武装，从事反动宣传，干扰东北政局，一直伺机恢复失去的天堂。所以，待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以后，这些人纷纷投入日本新主子的怀抱。1932年2月5日，日本军队占领哈尔滨，白俄构成了欢迎日本侵略军进城的人群的主要部分。他们向日本侵略者欢呼“万岁！”，同日本人接吻、握手和拥抱，在这种下贱的表演背后，他们的动机就是想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白俄政府，这是旅居中国东北的白俄流亡者的梦幻，他们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企求日本人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梦想。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些白俄不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日本当权者对白俄也格外关注，利用其充当反苏、镇压东北人民的别动队。

1935年，在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征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后，在哈尔滨建立了白俄事务局，这是一个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组织，他们命令白俄军官弗拉谢夫斯基为局长，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专门在日本人书就的公文上签字。1936年1月，伪哈尔

滨警察厅日本人副厅长根据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的命令，在伪哈尔滨警察厅设立了募兵处，为所谓白俄部队招募士兵。这支以伪满洲国治安部名义成立的白俄军队，强行征招白俄人，欺骗他们说，为了实现你们的梦，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重建沙俄帝国，快去参加白俄部队，拿起枪来，去勇敢地战斗吧！

这支白俄部队的队部设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邮政街，部队长为日本人浅野节，故名浅野部队，后来这支部队移至吉林德惠第二松花江，又称其为第二松花江部队。这支部队属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本部第三班兵事室指挥。伪哈尔滨警察厅还制作了大量苏联红军的军服，供这支白俄部队使用。这支白俄部队经常在日本人的指挥下，穿着伪哈尔滨警察厅提供的苏联红军的军服，在中苏边境地区干起抢劫的勾当，还假作退往苏联境内的模样，使当地人确信劫盗者千真万确是苏军士兵。

1935年到1936年，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科长川手与九郎，秉承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秦彦三郎的旨意，与特务机关和日本宪兵队配合，利用白俄事务局的白俄，到中东铁路苏联籍员工中宣传，苏联是真正凶恶的魔鬼，回国要被当作日本间谍处死，并伪善地许诺给他们转为无国籍侨民。威胁那些不愿转为无国籍侨民的苏联籍员工，要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并且强制驱逐出境，甚至辱骂、胁迫、恫吓，无所不用其极，强行将许多苏联籍员工转为无国籍者，强迫他们留在东北不要回国。

反苏反共是白俄事务局的最高宗旨。1939年4月30日，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根据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让白俄事务局煽动哈尔滨的无国籍白俄侨民举行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那些白俄呼喊反苏口号，演出了一场丑剧，在示威游行队伍旁是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派遣的所谓维持秩序的伪警察。

日本人还利用白俄事务局把几百个白俄家庭迁移到离海拉尔35公里靠近苏联边境的三岔河去。此后，这类移民活动从未停止过。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不遗余力，强行将哈尔滨市的白俄侨民转业，把他们送到日本特务机关在亚布力和安达等地设立的开拓团训练所，强制他们在那里一边务农，一边接受训练。

对于这些移民，日本人最先曾许诺供给经费、农具、牛羊和住宅，但他们得到的是痛苦和失望。他们在日本兵的监视下，从事农作，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他们的劳动所获被日本人无情地夺去，妻子、女儿被日本人污辱践踏。

伪警察机构参与的日伪当局强制白俄移民，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自1936年，由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组织白俄移民，至1943年，在大兴安岭绰尔河流域、嫩江以北的甘河流域、佳木斯南部的南岔、密山北部的十里洼等地设立了白俄移民村。这些白俄移民村的设立，把矛头直接指向苏联，白俄移民被强制从事各种反苏活动，甚至被派遣越境，窃取苏方情报。日本关东军还把这些白俄移民村作为选拔、贮备、训练特务的基地，对苏开展间谍战。许多白俄移民成了这场间谍战的牺牲品。

白俄曾对入侵东北的日本人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时间证明了一切，他们的幻想被日本人的铁拳击得粉碎，成千成万的俄国难民逃离了东北，很多人成了阶下囚，一些人被枪杀或谋害了，无数的白俄少女被日军奸淫了。他们的钱财和产业被无情地掠夺了，这就是热心为侵略者歌功颂德的白俄人，所得到的报酬。

“接待”李顿调查团

1932年5月，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由吉林来哈尔滨进

行所谓“满洲问题”的调查。日伪当局为掩盖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北的真相，早在李顿调查团到哈尔滨之前就开始制造骗局，欺骗世界舆论，防止爱国人士接近李顿调查团；李顿调查团到哈尔滨后，监视甚至恐吓李顿调查团成员。日伪当局的这些卑劣行为，伪警察机构也在其中。

国联李顿调查团到哈尔滨视察前一个星期，各类警务机关都奉令逮捕和监禁所谓的一般不稳分子，以防他们向国联调查团有任何申诉。被拘捕者，必须要待国联调查团离开之后，方可释放。许多人在调查团走后三四十天，还被囚禁，不见天日。

日伪当局为了制造哈尔滨人民是拥护“满洲国”的骗局，印了成千上万张的“满洲国”小国旗和傀儡溥仪的小相片。不单是哈尔滨的居民，连住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所有中国人、俄国人及朝鲜人，每人都必须用一元钱来买伪满洲国旗和溥仪的小相片。为了推销这些东西，还组织了无数的推销队，他们挨家挨户强迫居民购买一套，并对居民恫吓说：如果在李顿调查团在哈期间，门窗上不好好挂出这些东西，全家就要遭到逮捕！那些不能立即拿出钱的穷苦人，限15天内把钱送到警察所去。

哈尔滨的马迭尔饭店，是调查团重要代表的下榻之处。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派出大量的日探和俄探，并通过东省特警处的日本顾问派遣伪警察装做普通旅客，占据了代表卧室的邻近房间。三个伪警察冒充为饭店职员，扮作中国茶房、侍应生、房间侍役、大厅侍役和其他杂差。哈尔滨的日伪警察当局特别雇用了三个日本女子扮作女侍监视代表卧室。其余几十个探员都分散在餐室、阅报室、会客室和饭店四周。至于其它各旅馆，象格兰德旅馆和新世界饭店都住着调查团的代表，也如法炮制，做了严密的布置，绝对阻止任何人接触调查团。

到哈尔滨的调查团团长、英国人李顿爵士不会想到，在调

查团下榻的马迭尔饭店二层楼上，一个工艺学校的俄国青年学生被日本杀死了。他的死是因为他想要递信给李顿爵士，抗议日本人查封了他求学的那所学校。在马迭尔附近有一百五十多个中国人和五十多个俄国人被捕。

作为国联调查团顾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随调查团到哈尔滨，在哈尔滨，这位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家顾维钧也领教了日伪当局是怎样“接待”他的。^①

西门·开斯普绑架案

1933年4月，在哈尔滨发生了震惊国内外的“西门·开斯普绑架案”。

西门·开斯普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趁学院假期来到他父亲约瑟·开斯普的身边。约瑟·开斯普在日俄战争后，来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开了一个修理钟表的小店，几年后，这个小店变成了珠宝店和银楼。以后，他成了远东最著名的珠宝商，并做了哈尔滨最上等饭店——马迭尔饭店的股份老板。日本人侵占东北的时候，约瑟·开斯普经营着大珠宝店，并且是马迭尔饭店的独资老板，又是一家戏院公司的经理，这家戏院公司经营着一连串的戏院和影戏院。外界传说他的财产从五十万到数百万，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关于他敛财致富的手段和方法，社会上也有各种不同的流言。

日本人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财产，开斯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担心财产被日本人巧取豪夺，设法努力避免如此的结局。他的两个儿子当时正在法国读书，当他的儿子成为法国公民之后，他立即实施了他的计划，以避免日本人侵夺他的财富，他把马

^① 可参阅《“九·一八事变”卷中顾维钧所著“我在国联调查团的一段经历”一文。

迭尔饭店以及他的戏院的产权转移到他的儿子的名下，产权转移手续一经完成，法国的三色旗就高挂在马迭尔饭店以及所有他的戏院的屋子上了。约瑟·开斯普的行动也极谨慎，他不大外出，偶而出门，也常带着武装的保镖。他在马迭尔饭店底层的居室象一所堡垒，门窗上都有很粗的钢条，而且里里外外有很多俄国卫士。

西门·开斯普是一个俊美的男子，而且是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他的父亲为他骄傲，并为他安排了哈尔滨最上等的剧院举行独奏演出会。但这位父亲万万没想到，在他的儿子周围张开了一张可怕的网，并且要置他儿子于死地。

哈尔滨的日本宪兵已经在捕捉西门·开斯普的行踪，他们在马迭尔饭店布下了密探，侦察西门·开斯普的活动。执行这项罪恶的是日本宪兵队的秘书兼译员中村，伪满警察则成了帮凶。伪哈尔滨警察厅的督察长马丁诺夫和中村密谋，指使马丁诺夫手下的15名匪徒实施绑架西门·开斯普的行动计划。这些匪徒都是《我们的路》报主笔及法西斯俱乐部首领拉查伊夫斯基精心挑选的，避免了日本人直接出马带来的一些麻烦。中村手下的密探，很快就侦查到西门·开斯普的行动规律，并把一切都报告给中村。

1933年4月24日午夜，当西门·开斯普驾车来到一个少妇的门前时，一伙匪徒包围了他的车子，把他从车里拖出来，蒙上眼睛，塞进另一辆汽车里，被带到哈尔滨附近的一个藏匿地。约瑟·开斯普收到一封匿名信，要求他为他可怜的儿子付出30万元的赎金，以换回他的儿子。然而他坚决地拒绝了，老开斯普不肯支付这笔巨款。在匪徒威胁要杀死他儿子时，他也丝毫不动摇，他坚持必须在儿子平安回来之后，才肯付出几千块钱。一个月之后，他收到了匪徒寄给他的一只耳朵，那是他可怜的

儿子的。但这可怕的信息，也仅仅使老开斯普将赎金增加到了35 000元，而且必须在他儿子获释之后才能付钱。

当法国驻哈尔滨领事馆获悉西门·开斯普被绑案后，立即向哈尔滨日伪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迅速侦缉票匪，营救西门·开斯普。法国副领事晓邦是个精明的青年，他深知日伪当局的答复仅是隔靴搔痒，就雇了几个能干可靠的人员，开始了自己的侦察。他不久就得知了真相，但是他需要证据，就吩咐他的人，把绑架西门·开斯普的匪徒中最年轻的一个叫康密萨兰科的人捉到领事馆。康密萨兰科不仅供述了实情，并且写了供状签字画押。此后，他被释放了。第二天晓邦副领事亲自去见伪哈尔滨警察厅长，递上一张控告和绑案有关人员的呈文以及康密萨兰科的供状的副本。

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对此特大绑架案，经严密侦察，侦知此案原委。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把侦察到的案情连同法国副领事晓邦的呈文以及康密萨兰科供状副本都报告了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伪满警察又表演了一次是日本侵略军的帮凶的角色，殖民地的警察，绝不会去控诉殖民地的主子，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立即吩咐康密萨兰科躲避到远离哈尔滨六百多公里外的绥芬河，同时秘密逮捕晓邦雇佣的人员。日本人办的两份俄文报也对晓邦实施最为恶毒的攻击，侮辱他是卑鄙龌龊的犹太人、赤匪、共产党的雇佣者等等。侮辱性的攻击持续了几个星期，后来竟弄到有一个法西斯党徒要和这位法国副领事来一次决斗。

可是，西门·开斯普被绑架的新闻早已传到国外，英、美、法等国的报纸都注意到了这一暴行。所谓绑架实际上就是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务人员雇佣的匪徒所为。这是无法阻止的成千上万的人私下议论的事实。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在接到把绑架案告一结束的指令后，授意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依照法国副领

事晓邦所起诉的名单，于1933年10月9日，将马丁诺夫和山得尔拘捕入狱。但其他案犯仍逍遥法外，刑事科借口无从缉获，被捕的两人则矢口否认知道肉票的藏匿点。

在西门·开斯普被绑架期间，有关赎金的试探性接触仍在进行。绑匪们催促小开斯普写了很多信，由匪徒转交给他的父亲。可是那位老开斯普却不顾儿子的请求，对那些可怕的恫吓和威胁依然置若罔闻，丝毫不肯让步。他坚信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夸下海口，说他们将毫无所得地把他的儿子送回来，并向他表示道歉，在他儿子获释之前决不付出半个子儿。

当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知道了老开斯普的态度，他们表示：即使老开斯普肯出100万，他也永远不会看到他儿子生还了。日本人不让小开斯普生还的理由还有许多，因为小开斯普已和中村及日本宪兵军官谈过话，知道绑架他的俄匪后面，有日本人操纵，他会将此公布于世的。

逃匪在绥芬河的康密萨兰科被当地的警务机关拘捕，并被押回哈尔滨。他在绥芬河作了一次同样的供状，和在法国副领事前的供状完全一样。他的供状送到了哈尔滨，哈尔滨警方通过路警处得知4名绑架小开斯普的匪徒常在车站来去，1933年11月28日，当他们正想搭车去小岭时，警方将他们缉获，得知小岭正是小开斯普被藏匿地。

西门·开斯普被藏匿在小岭，由吉立正科和加拉斯科看守。到了交接时间，这两名匪徒仍不见换人看守，疑心出了岔子，感到不安。多心的吉立正科去车站好几次，打电话给中村，询问为何还不来人。中村有意隐瞒了被捕匪徒的消息，叫吉立正科耐心等待。当吉立正科去打电话的时候，另一名看守加拉斯科趁机和小开斯普做起交易来。他要求小开斯普写一封信告诉他父亲，让他父亲支付加拉斯科一万元钱，他就可以放了小开斯

普，而老开斯普也不必再付钱给日本人了。交易当然是做成了。当吉立正科打完电话回来时，察觉他们表情有异，知道他们肯定有某种勾当。加拉斯科坚决主张当晚就回哈尔滨，更加重了他的疑心。吉立正科把他的怀疑告诉了中村，中村让他转告加拉斯科，让他在5点钟到车站货场见面。

中村和一个日本宪兵以及重新获释的康密萨兰科到约会地把加拉斯科抓住，搜出了小开斯普写给他父亲的信。虽然他们不懂法文，但那10 000的数字却是认得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中村拔出手枪击毙加拉斯科，然后通知吉立正科打死西门·开斯普，迅速回哈尔滨领护照和金钱逃匿。然而警方按宪兵的指挥，在呼兰车站逮捕了吉立正科，并宣称加拉斯科在拘捕时，被捉他的警察枪杀了。一个匪徒在日本人利用之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警方宣布找到西门·开斯普的尸身时，已经是1933年12月3日了。尸身覆盖着泥土，在一个浅坑中，很惨的景象。几个月的禁锢，严酷的私刑，使这个24岁的青年只剩下一副骨架了，东北北部零下20多度的严寒，冻结了他的面颊、鼻子和双手，皮肉大片大片被冻脱落，肌肉内部已经腐败，双耳被割去……在长达几个月的监禁中，小开斯普不曾洗澡、修面和理发，尸身上积满尘埃和污垢……

然而惨剧并未结束，西门·开斯普的母亲拖着未痊的病体，从巴黎赶往哈尔滨。当她在上海惠中饭店进早餐时，从字林西报上获悉她儿子被害的新闻。她的一丝希望不复存在了，绝望地发出震颤的哀号，悲怆地诅咒这可恶的人世。小开斯普的遗体运回哈尔滨，老开斯普不顾友人的劝阻，坚决主张把棺木搬到他的屋子里，执意让仆人揭开棺盖，以便同他可怜的孩子再见上一面。这震惊是如此之大，竟使他发出疯狂的嚎泣。

整个哈尔滨愤怒了，不单是犹太人、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甚至有些日本人，都在诅咒这暴行。被害者出殡之日，整队整队的日本宪兵和一个联队的步兵从齐齐哈尔开来，以加强本地的兵力。在哈尔滨，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葬仪，尽管日伪当局禁止仪仗通过大街，尽管有大量的军警，全哈尔滨的居民都涌上街道，跟着柩车，直到犹太坟场。

法国领事、开斯普家族以及外国报纸的抗议越来越强烈，他们一致要求将谋杀西门·开斯普的凶犯移送法庭惩办。直到东京来了命令，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科长江口治才秉承宪兵队的旨意，草拟了一份公诉状。关在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警察监狱的6名绑匪，在公诉状中竟然被称为：最诚实最优等的公民，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真正俄国志士。即使他们绑架了西门·开斯普，其动机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筹集反共团体的经费。江口治宣称不能把他们视为盗匪，也不能把他们视为普通犯人。在开庭的时候，应把他们当作政治犯。这些被告所犯的罪名是什么呢？公诉状上并未提及绑票。西门·开斯普的耳朵是加拉斯科割的，小开斯普也是加拉斯科杀害的，但加拉斯科已经死了，不能抵罪了。那么是勒索金钱吗？老开斯普并不曾付过分文。江口治的公诉状可加之于这6个被告的罪名仅仅是情有可原的“企图勒索”，而这又并非出自私利而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江口治的公诉状被哈尔滨整个领事团视为可憎的暴行。最后这6个人犯被交给高等法院，关入监狱。

绑架和谋杀西门·开斯普的案子摆在了伪满中国法官的面前，他们不满于日本人所作的偏颇之词的书面说明，试图弄清案情的真相。日本人对此大动肝火，特务机关吩咐所有的警务机关，如果法官来向他们探听消息，让他们一致咬定江口治所写的公诉状的事实。并派密探监视法官们的住宅，把访问他们

的嫌疑分子加以逮捕和审讯。日本人不希望再出现一个晓邦事件。

但是，被日本特务机关雇佣的间谍万斯白却在一个星期后，把所有文件都交给了法官。证明这些被告和政治完全无关；割小开斯普耳朵的，是山得尔；杀死小开斯普的，是吉立正科，而不是加拉斯科。万斯白还向法官提供了绑匪被捕时，从他们衣袋里搜出的证件。这些证件足以表明这些绑匪都是日本宪兵的探员，没有这些证件，他们是不能在铁道线上任意行动的。

日本人对中国人法官从秘密渠道获得的消息，还蒙在鼓里。当中国人法官宣判，6个人犯以抢劫、绑架和谋杀罪，两个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四人被判处死刑。这一消息，使哈尔滨全城轰动。但两天之后，首席法官被秘密拘捕，日本人宣布判决无效。6个月后，由3个日本人法官结束了这一案件，借口这些绑匪是爱国行动，把犯人统统开释了。一起震惊国内外的“西门·开斯普绑架案”就这样结束了，伪满警察从所谓的侦察到提出公诉，都不过是殖民统治机器的一个部件，它的全部行动完全受日本军事占领当局的指挥。

劫夺中东铁路与秋林洋行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把掠夺的铁路、港口、水运和公路运输的经营权都交给“满铁”独家经营。东北境内只剩下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还未被日本人为攫取。对于这条铁路，日本侵略者当然也是急不可耐地要夺到手，于是日本人夺取中东铁路采取了各种卑鄙手段，伪满警察也在其中施展了各式各样翻新的罪恶活动。

为夺取中东铁路，日本军部指使满铁修筑军用备战铁路，矛头指向边境，并与中东铁路交叉，把中东铁路截成数段；千方

百计破坏中东铁路的正常经营，制造事端，禁止中东铁路的国际直通货运，割断中东铁路同苏联铁路的联系，迫害和逮捕在中东铁路工作的苏籍职工等等。而中东铁路的中心地哈尔滨更是甚嚣尘上。伪满协和会哈尔滨地方事务局，在道里总商会召开所谓“北铁问题”座谈会，要求中东铁路管理局降低高率运费，并改用伪满国币；紧接着，哈尔滨一百多个伪经济团体代表千余人到中东路理事会和管理局“请愿”，要求运费减价和改用伪满币。日伪当局还出动警察，名为维持治安，实则支持纵容，对中东铁路管理局施加压力，扰乱中东铁路当局的正常工作秩序。

1935年3月23日，苏联政府置中国政府关于苏联单方面处理中东铁路无效的声明于不顾，正式出售中东铁路给日本侵略者。

在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日本陆军少将秦彦三郎的指挥下，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配合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日本外务省驻哈尔滨办事处制造了一系列迫害、污辱苏联铁路员工及侨民的事件。

1936年2月至3月间的2个月内，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长川手与九郎警正，动用了厅内特务科、外事科的全部警察，对中东铁路的苏联籍职员、工人进行所谓甄别。在苏联籍员工回国前，对一百二十多名员工的住所实施搜查，没收了他们保存的有关日本及中国的资料。同年4月至8月，中东铁路苏联籍员工撤离东北返回苏联时，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与伪哈尔滨铁路警护队又联合行动，对撤离人员实行非法检查，并以监护的名义，押送他们直至出境。

在哈尔滨，对苏联侨民的迫害并不因中东铁路所有权的易手而停止。1939年春，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科长羽切正平下

令，制作了大批圆形牌子，大小如一分铜币，分白色和黄色两种。白色牌由无国籍白俄人佩带，黄色牌由苏联侨民佩带。这种对无国籍白俄和苏联侨民的侮辱性措施得到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的许可，并命令让无国籍白俄人和苏联侨民强制佩带。他们出门，牌子被强制挂在胸前。这种污辱人格的暴行，遭到苏联侨民的强烈反对抵制。到年末，日伪当局不得不宣布取消。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哈尔滨日伪当局对苏联侨民的迫害和镇压急剧升级，达到了极点。在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长的阴谋策划下，直接指挥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协同日本宪兵队制造了一系列迫害苏联外交人员及侨民的罪恶事件。首先以战时有害分子为名逮捕了在哈尔滨的苏联人以及其他外国侨民共120名，对他们实施非法监禁，分别关押在哈尔滨市内各警察署拘留所。

其次，集中了全部警宪力量对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实行了全面大搜查，并予以查封。以战时非常法为由，没收领事馆所有动产不动产，并且将领事馆全体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80余人全部监禁在领事馆内。

另外，在全市大肆逮捕苏联侨民，逮捕了年龄在20岁左右的青年男女计200余名，把他们全部囚禁在道里苏联人中学校内，并对他们施以刑讯。

位于哈尔滨南岗大直街与义州街交叉处的秋林洋行百货部，是幢古朴典雅、庄重优美的“巴罗克”式建筑。1936年6月的一个早晨，数百名伪满警察和日本宪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严密把守住还在营业的百货部各个出入口。一名伪警官命令宪兵和伪警察，制止百货部里人群的骚动，保持安静。接着，他向趋于平静的人群宣布，警方获悉秋林洋行秘密收藏军火、隐匿共党谍报人员，私通苏联，图谋暴乱，奉哈尔滨日本宪兵队

本部和伪哈尔滨警察厅的命令，对秋林洋行百货部进行搜查，无关人员须保持安静，经检查退出现场。凡鼓动骚乱喧哗者格杀勿论。

原来，在这一天，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和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出动了全部宪兵和警察，以秋林洋行私藏军火为理由，对秋林洋行百货部和洋行经理、董事等高级职员住宅大肆搜查。军火自然没有，但高级职员防身用的手枪和他们平时打猎使用的猎枪被没收了。日本人以所谓违反武器取缔法为理由，逮捕了秋林洋行总经理卡西安雅诺夫及大股东卡蒂亚叶夫、巴宾索夫与萨尔曼诺夫等人及其眷属，他们被监禁；受尽鞭笞桎梏，直至接受日本人强加于他们的条件为止。日本人要他们做的，就是将秋林洋行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给日本人。这种价格在俄国人看来，简直是豪夺。如果这些俄国人拒绝日本人的要求，等待他们的将是无休止的刑讯拷打和无限期拘禁。日本人明确地暗示了这一点，假如他们胆敢那样做的话。

秋林洋行是一家俄商企业，这家洋行历史久远，最初设在俄国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称“秋林公司”，后来遍布俄国远东各大城市，形成庞大的经营规模，在帝俄时代被称为“远东事业的先锋”。秋林公司进入中国东北始于中东铁路的修建。秋林公司于1900年5月14日在哈尔滨香坊开设了它的跨国公司，取名秋林洋行。1902年迁至南岗，不久在道里靠近江边码头附近增设一家商店。1904年秋林洋行在南岗大直街与义州街交叉处修建了商业大楼，于1908年9月竣工使用，哈尔滨第一家大型百货店的开业，轰动了哈尔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扩展到一面坡、吉林、沈阳、齐齐哈尔等地，形成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商业与工业一揽子经营模式。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秋林公司被收归国有，对设在

中国东北的秋林洋行仍保留私人资本所有权，在莫斯科的卡西安雅诺夫于1922年获准偕家属和有关股东到哈尔滨定居，继续经营秋林洋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秋林洋行的经营日趋衰落。秋林洋行因负汇丰银行500万元的债务，押与汇丰，故该洋行各商店全部悬挂英国国旗。

1936年6月间，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陆军少将秦彦三郎指示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和伪哈尔滨警察厅共同采取行动，策划制定强行剥夺俄侨经营秋林洋行的计划，图谋吞并俄侨的财产。当时，隐匿了自己身份以所谓顾问的名义打入秋林洋行进行侦探活动的日本宪兵队少佐高木，与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科长川手与九郎警正，共同谋划强制收买的阴谋。高木掌握了秋林洋行经理及高级职员都随身携带防身的武器，并拥有猎枪，以供假日到山林郊外打猎的情况，就提出以非法收藏武器，图谋暴动的名义对秋林洋行实施搜查，拘捕总经理及高级职员，然后提出收买的要求，迫使他们就范。于是，秋林洋行以及经理、董事等高级职员的宅第被搜查了，他们和他们的眷属被拘捕。事情就如此简单，日本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日本人最终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收买了秋林洋行在南岗义州街的总店，道里中央大街、国课街、松花江街、伪满首都新京等地的分店，安达的牧场以及亚细亚剧场。在东北历史上名声赫赫的“秋林洋行”变成了“秋林洋行株式会社”，秋林洋行换了主人。

警匪合谋

“哈尔滨，以前是愉快的，现在成了著名的人间地狱了……生命这样不安全的地方，恐怕是全世界所没有的，哈尔滨的居民……不论到哪里去，即使在白天，如果不带武装，就会发生生命的危险。拦劫、抢劫、谋命和绑票，是常有的事。

外国的领事不得不带着卫士。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同波士顿州的议员丁克汉君到松花江去，他那时正在游历满洲。我们去访问豁达的翰森君，一位到处最受敬爱的总领事。在翰森君的小屋面前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杆来福枪和自动手枪，两边就是警防盗匪的卫士。”

这是美国著名作家埃特加·斯诺在一篇日本建立新殖民地的论文中，对哈尔滨在日伪统治下的社会状况的叙述。面对这种社会状况，驻哈尔滨的外国领事团曾多次开会，讨论日伪警察特机构操纵、唆使匪徒绑票和日本货独占市场的事。有几个外国领事甚至向哈尔滨日伪当局提出日本人参与这些暴行的书面证件。

恐怖笼罩着整个东北，哈尔滨更是如此，每个警务机构都豢养着一批惊人勒索的匪徒，警匪一家，相互勾结，干着坑害百姓的勾当。有钱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被敲诈巨款，以求获释。有许多被绑的肉票，尤其是中国人和犹太人，他们被绑票付出赎金后，并不去报告伪警察厅，因为他们深知绑架他们的匪徒不是警方豢养的就是与警方合作的。如果他们去申诉，他们或许在已失去的赎款之外，还会遇到更大的麻烦，甚至有生命之虞。

有个叫王魏卿的富翁以25万元赎出了他的儿子，然后他又拿出50万元来赎他自己的自由；另一个叫张庆和的商人先后被绑架3次，共花了50万元的赎金；穆蔚堂是一家百货商店的老板，他被绑了2次，每次付出赎金10万元；商人吕泰，先用10万元赎金赎出了他的儿子，后又以5万元赎金换回自己的自由。

开设诊所的开森塔克被日本宪兵唆使的匪徒绑架2次，每次都被敲去巨额的赎款；赫立森医生也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达拉先果是一个商人，他先被日本宪兵抓去，付出了15000元，后来又伪警察厅敲去5000元；商人悌斯明尼斯基是以15000

元赎买了他的性命；希来尔得福罗梭斯是在离开犹太人教堂时，被6个武装人员绑架的，在现场亲眼目睹者有二百多人，伪警察却视而不见，泰然处之决不干涉，希来尔得福罗梭斯在暗室中被关了105天，最后付出25 000元赎金之后，才恢复自由；3个受日本宪兵队长指使的匪徒，去绑架一个波兰学校的学生，匪徒错绑了一个天主教堂收养的孤儿，而宪兵队长却不肯将这小孩释放，竟然说天主教堂是有钱的，如果这孩子贫穷，就让教堂付钱好了，这孩子被囚禁2个月后，教堂终于被榨出2 000元钱，才把小孩赎了出来。

被绑架者如果被敲诈去金钱能赎回性命还算是幸运的，还有不少人在金钱被敲诈之后，竟连一具完整的尸首都未留下。

犹太人高福满，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大药房，外界传说他很有钱。1932年3月11日晚上11点钟，他被几个受日本宪兵队雇用的白俄匪徒绑架，关在南岗日本宪兵队本部的地下室里，12日又把他移到马家沟的一座中式小屋里。匪徒们要勒索高福满付出3万元的赎金，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完全能够负担。在讹诈赎款的时候，一个白俄匪徒竟活活地掐死了高福满。当人们发现高福满的尸体的时候，他的面部充满了很深的灼痕，几乎不能辨认原来的面貌。烧焦的皮肉已腐败发黑，散布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因为他的尸体太重，竟然将其分尸，割成四块，抛在沟壑之中。在高福满惨遭虐杀之后，绑匪们还在和高福满的家庭谈判赎金的数目，而高福满夫人在她丈夫遇害后的3个星期之后，还把18 000元赎金付给日本人，想赎回她的丈夫的自由。

日益猖獗的绑匪使社会治安极度恶化，疯狂的绑票害得人人自危。哈尔滨外国领事团对日伪当局的指斥日趋激烈，社会舆论也迫使日伪当局不得不注意。日伪当局召集伪警察界开了

一个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应付社会舆论。两天后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在哈尔滨各报登载告示说，警方已发现谁是真正的绑匪，谁使得哈尔滨和它的邻区发生许多恐怖事件。这两个凶恶的罪犯就是凡勒斯基和门特立卡。警察厅现在正在密查之中，大约不出几天之内，或者仅在几小时内，就可以真相大白而使他们难逃法网。

这欺骗社会舆论的告示宣布数日后，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又以许多“事实”供给各埠各报，来罗织这两个“人狼”、“凶徒”的罪状，说他们曾绑过许多人的票，并在每次大肆渲染之后，都宣称他们不久将被捕入狱，予以严加惩处。但人们知道凡勒斯基是个什么东西，凡勒斯基因盗窃犯案被囚禁了3年，刚从狱中出来，许多凶案同他毫无关系。至于门特立卡，只不过是一个专事扒窃的小蠢贼。

一天下午，哈尔滨各报都出了一张“号外”，说凡勒斯基和门特立卡在哈尔滨沙曼屯的一间小屋子里被发现，警方当即奋勇围捕，经自动手枪射出150粒子弹之后，这2个凶徒终于被击毙了。以后几天的报纸上，登满了当时激烈战斗的详细描写，介绍警察如何的勇敢，又怎样在盗窟中抄获许多军火和武器。宣告哈尔滨和北满从此可以安宁度日了。

但事实是，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派人私下劝告凡勒斯基和门特立卡，让他们暂时到沙曼屯去躲避一下，待事过境迁，风声平息之后可出来。这两个笨蛋上了伪警察的圈套，当他们正在大嚼面包和腊肠的时候，被架在窗口上的机关枪送了命。凡勒斯基胸部中了31颗子弹，门特立卡背部穿了19个弹孔。在沙曼屯，留下了他们僵卧的尸首。

这场骗剧演过之后，绑票风却愈演愈烈。一个犹太富人却普佛斯基被绑架，拒绝写信用钱来赎他，受了3个星期的可怕折

磨，他仍坚持拒付赎金。最后，他被警宪机构的俄探谋杀在哈尔滨附近的庙台子，并抛尸于荒野。

伪警察也直接出面诈骗钱财。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有专门的侦探组织，打探人家的家庭聚会或宴餐。诸如寿辰、订婚、结婚、宴餐和其它聚会。一旦打探清楚，伪警察就会突然从天而降，以聚会超过10人以上，未被警方允许等各种名目，将聚会者逮捕。当然这类逮捕无非是为了敲诈钱财，被捕的人要缴纳很重的罚款才可出狱。还有各种别的骗钱方法，所谓户口调查即为一例。伪警察当局常在报上公布，借口某种原因，门牌号码又要变动。伪警察挨家挨户调换旧门牌，每个新门牌要征收1元钱。仅值几分钱的一块薄薄的马口铁做的门牌，并且又是一用再用的。随着此类事情的增多，伪警察的钱袋自然逐渐丰满，并更加乐此不疲。哈尔滨的环境也变得更加恶劣了。

迫害宗教界人士

哈尔滨地区不仅有佛教、道教，还有西方传入的基督、天主、东正教和阿拉伯传入的伊斯兰教，所以在哈尔滨地区有着众多的宗教团体和信教人士。由于东北的宗教与关内各有密切交往和联系，同时西方传教士的母国，如美、英、法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敌对国，日本侵略者认为这些西方传教士持与母国同样的立场，有碍殖民统治政策的贯彻。因此，日伪当局格外注意和防范宗教界人士的政治动向。

为了把东北的宗教事业完全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轨道，日伪当局在实行宗教统治的过程中，始终把宗教界人士置于警察、特务、宪兵的严密监控之下。日伪宪兵、警察、特务以对宗教界人士实行监控的方法主要通过收买宗教界的僧侣做密探，搜集宗教界人士的思想动态，日常宗教事务活动的情

况，提供给日伪当局。据伪警察谢翰声说：哈尔滨极乐寺的某和尚充当了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密侦，负责收集和了解寺内僧侣的动向和其它政治经济情况。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和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侦谍班收买了清真寺某人，利用为密侦，对清真寺的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侦察，收集情况。

在哈尔滨，居住着大批白俄，他们信奉东正教。为侦察东正教的活动，由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选派受过训练的白俄侦探伪装教士或信徒，打进东正教会内部，或者收买白俄信徒收集情报，特别是白俄侨民同苏联的关系，以及苏联领事馆人员的活动情报。1934年，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还操纵东正教大主教在哈尔滨建立一所弗拉基米尔学校，6年多的时间里，培训神职人员172人，其中有11人被培养成日本宪兵队和特高科的专职特工人员，而日本特务中村辛一直操纵和控制这所学校。

除了收买密侦外，作为控制宗教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利用大批日籍宗教界人士充当特务，直接打入哈尔滨各宗教团体从事特务活动。这些人大多披着宗教外衣，奉行日本关东军监控东北宗教及宗教界人士的特殊使命。日本佛教总寺院先后派遣日僧一番濂顺证、释仁天（俗名今井昭庆）等人打入极乐寺把持了该寺的宗教事务。因极乐寺的慈云和尚追随朱子桥将军抗日，在该寺的日僧今井昭庆勾结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对寺内的僧人挨个盘查，搞得人心惶惶。居住在极乐寺的日本东本愿寺和尚高日则是一个接受了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秘密指令的特务，专门从事收集哈尔滨大同佛教会和极乐寺僧侣思想动向的特务活动。伪特务科还利用哈尔滨大同佛教会的某会长，在该会内收集一般情报。据日本人大谷湖峰对哈尔滨日籍宗教人士的调查，除极乐寺的日本僧侣外，当时（1936年7月）计有日本佛教各派人士（禅宗、真言宗、日莲宗等）吉田信教、和田

吉太郎、吉川定次郎、宫脇亮夫等10人，基督教士仓田俊丸、高桥良、吉持久雄等6人，神道、大本、天理等日本教士八尾道之助、新泽伟惠等8人，分别安插大妙法寺、东清教会、本愿寺、基督教会、马家沟基督教会等场所，拥有信徒四千九百多人。在这些僧侣中，混有不少特务间谍，基本把持了哈尔滨各寺、院、庙、堂的实际宗教事务权力，并通过日本僧侣开始组织伪满官制化的宗教团体。

为了严密监视和控制中国佛教僧侣，日伪警察特务经常对佛教寺院进行搜查、盘问，甚至无故逮捕、刑讯中国僧侣。1943年4月，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协同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松花江北松浦镇马家船口极乐寺分院的部分僧侣，刑讯拷问一通后释放，连被捕僧侣也感到莫名其妙，无端遭受一场皮肉之苦。可见日伪警察对佛教僧侣的随意迫害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日伪警察对哈尔滨的西方各宗教团体的神职人员，大多列入各级警察、特务、宪兵机构的重点监视对象，对他们严加监视，无端迫害。1936年5月，哈尔滨基督教浸信会牧师美国人查尔斯·莱昂纳多携夫人及同会牧师去东部边境地区传教。牡丹江宪兵分队立即派员跟踪盯梢，沿途伪警察部门也接连设卡盘查，直至莱昂纳多等人返回哈尔滨为止。对于中国神职人员也列为日伪警察特机关的重点监控对象。如对哈尔滨基督教浸信会会长孔俊轩，日伪警察特机关的调查材料中列有此人的原籍、出生年月日、社会经历及任职、家庭人口、资产和经济状况、入基督教动机、本人兴趣等等，翔实得令人吃惊。调查材料最后归纳称，此人“家境没落，加之年老，已没有往日的势力和威望，但由于和道外商务会长李明远、资本家羽子明、前市家务会长姚锡九、同记商场主武伯祥等人均有深交，仍具

有潜在的势力。”可见，日伪当局对基督教人士久蓄戒备之心。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同美英等国的关系公开破裂，基督教外籍神职人员先后被强令驱逐或逮捕关押。如在哈尔滨市浸信会的美籍传教士端礼宾，被冠以“间谍罪”拘押监禁。1942年的一天，哈尔滨浸信会牧师蔡约翰被捕，严刑拷打逼问口供，让他供出与美国人兰马丁的关系，折磨了半年多，才把他释放。当时重要神职人员几乎都被列入“要视察人”名单，日伪警察、特务、宪兵随时会登门找麻烦，甚至同神职人员有社会交往的局外人也遭到盘查、盯梢。

日伪当局为加强法西斯统治，强令伪满洲国境内信奉傀儡溥仪从日本捧回来的“天照大神”，任何教派不得以各自信仰为借口拒绝供奉。在日伪当局的淫威下，各教派不得不设立敬奉“天照大神”的神龛，按日伪当局的要求顶礼膜拜，稍有怠慢或不敬者便要招致惩治。1945年初，哈尔滨的东正教的一部分传教士和信徒拒绝参拜哈尔滨的日本神社及哈尔滨的建国神庙，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长影山善次郎亲自出马，大兴问罪之师，威胁东正教大司祭得米多力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将停止供应该教堂所用的蜡烛和灯油。甚至对日籍基督教牧师，也因不敬拜天照大神而遭逮捕。哈尔滨圣洁会兼职牧师原雄一认为敬拜天照大神是与自己的宗教信仰相违背的，因为基督教圣经中十条诫命的第一条是：“除了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原雄一和圣洁会日本东京总会会长采取一致态度，不敬拜天照大神，被抓起来，关押了两年。

日本侵略军占据东北后，急需物色可资利用的各种社会势力协助其建立和维持殖民统治秩序。

东北的家理教源于清康熙年间以长江、大运河漕运民工为主体组成的青帮。家理教传入东北后，在东北的军、政、绅商

各界都有人加入，连普通的平民百姓也有加入的。对于这样一个成员广泛、背景深远又同关内有密切联系的半公开结社团体，日伪当局是绝不会放过的。伪滨江省警务厅特高科的大黑股长，在一份秘密报告中说，家理教是一个“以搞暗杀、破坏活动为目的的秘密结社”，主张对其采取“断然的镇压政策，或者认其成为合法团体，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妥善的由国家引导、监督他们的行动。”日伪统治当局决计对家理教采取操纵、控制、利用的态度。日本关东军授意组成以冯谏民为头目的家理教代表团访日，并给予他们很高的接待规格，借以拉拢家理教。在拉拢的同时，一大批日本人，其中包括特务、浪人、工商界要人，伪满政府中日籍官吏等，加入了家理教，有的还成为辈份较高的成员。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特务警佐后藤令治便是受命加入家理教的日本特务。

后藤令治，中等身材，较肥胖，大脸盘，经常带浅黑色眼镜。粗通汉语，一般谈话，大致可以达意。后藤在日本时就当警察，以后又在朝鲜和旅大租借地当过多年警察。1941年前后，后藤在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任属官，在特务分室专门负责侦察家理教的工作。后藤加入家理教，并成为24辈徒，以此身份为掩护从事特务活动。后藤在家理教中的辈份很高，在自己家里摆香堂，收徒弟。他有很多中国人徒弟，当时哈尔滨一般家理教成员中，有许多人都同他有来往，关系极为密切。

后藤建立了“后藤工作班”，通过和家理教成员的往来，侦察家理教活动，并指示其徒弟收集各方面的特务情报。后藤在道里高士街哈尔滨汽船组长平野的住宅中，以家理教师徒关系的名义做为活动据点，建立了情报网。平野的儿子在伪五常县公署工作，后藤派遣家理教日本人成员绢田康协助平野的儿子做家理教工作。在“后藤工作班”还有一个日本人，年龄稍

小于后藤，个头不高，身材较胖，也是近视眼，常戴眼镜，是个伪警尉，经常和后藤在一起活动。后藤工作班还有中国人董心文、李万库、穆义恺等人，充当密探和特务腿子。除此之外，后藤工作班也进行侦察逮捕。据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翻译周质彬说，他曾在“松花塾”秘密拘留所里，看见后藤工作班的董心文和日本人一起去过堂提审犯人。后藤还依仗职权包揽诉讼。哈尔滨家理教中的人，凡和后藤的密切交往的，常常找他说官司，他便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合同外事班与“光”工作

日伪当局为了被他们占领的东北铁道线的安全，也为了侦缉活动于铁道线上的抗日活动。伪满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中央干部会审议决定，在伪满中央和东北各地设立合同外事班，隶属于各级警务统制委员会。其具体活动受宪兵司令部警务部第二课及各地宪兵队特高课或特务课领导。在哈尔滨也设立了同样的合同外事班，它由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哈尔滨铁道警护队和伪哈尔滨警察厅抽调人员组成。伪哈尔滨警察厅主要由外事科派遣科员参加合同外事班。在哈尔滨火车站内设立合同外事班事务所，由主任和班员在那里执行勤务。

检查、监视过往满洲国境内地区车站的外国人是合同外事班的主要活动，而重点是侦察搜索苏联谍报人员，在伪满主要大中城市清查国民党及英、美、法等国的情报机关。合同外事班设有护照检查所，查验护照签证。哈尔滨地区的外国人出行时，包括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外交人员，事先须经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执照股审核批准后，签发旅行护照。然后由外事科将签证护照者的出发时间和前往目的地通知合同外事班，由合同外事班派遣班员跟踪，伪装同行旅客监视其行动。

跟踪者把被监视者的全部活动，甚至上厕所及起床次数、途中接触人物、睡眠时间等，都记入尾行簿内，在适当的地点和时间再移交给别人继续尾随。合同外事班对于机动的谍报人员，根据时间、地点及具体场合，采取机动的方法予以拘捕；对固定的谍报人员，较慎重地进行严密的侦察，采取蹲点、化装尾行、反间谍潜入等手段，摸清间谍组织机构的人员、谍报方法，然后秘密逮捕，力图一网打尽。逮捕后立即组织刑讯，对有价值的谍报人员，尽可能地采取收买政策，作为利用者让其从事反间谍活动；对无价值的谍报人员，经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批准，送向日军731部队充当细菌试验材料。

伪哈尔滨市警察厅在哈尔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轮船码头、国际旅行社等处都派有外事科警察，协同日本宪兵队及伪哈尔滨铁道警护队盘查外国旅行者，检查验证旅行护照证件。还每天写出日报交外事科作为情报资料，发现可疑人即尾随跟踪。据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警尉大藪武雄回忆：“1939年8月间，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接到电话，是牡丹江地方保安局事务官山田从哈尔滨车站打来的。由他尾随苏联谍报嫌疑者，跟踪到哈尔滨，来电话要求将该谍报嫌疑者移交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继续尾随侦察。当时外事科研究确定将尾随任务交给白俄警察，但又考虑到白俄警察同被尾随者民族及语言上的关系而有所顾虑，所以由我和白俄警察一同前往车站接收尾随移交任务。在哈尔滨车站，山田事务官把被尾随者移交给我，由我交待给白俄警察之后，我即陪同山田前往饭馆进餐。

据说被尾随者是苏联籍公民，名叫保古达诺夫。此后我就将此事淡忘了。然而时过半月左右，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来了一位白俄女子，说她丈夫保古达诺夫去牡丹江市，进入一家百货商店后再也未见其出来，此后即去向不明，要求外事科帮助

查找。我听说此事，即想起此人姓名同前次山田事务官移交的谍报嫌疑者姓名相同，当时即向牡丹江市警察厅发出照会公文，说明查找之人与前次被尾随的苏联间谍嫌疑者姓名相同，同时又在牡丹江市失踪，可能同为一人，希望牡丹江市警察厅迅速侦查此人。但牡丹江方面没有任何答复。以后失踪者家属多次来外事科督促。外事科又向牡丹江市发出几次公文，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我听外事科老科员们推测，说此人肯定在牡丹江被逮捕，监禁在牡丹江地方保安局，或者早已被秘密杀害了。”

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除对在哈尔滨的外国侨民进行特务活动，对各国在哈尔滨的商社、宗教团体、外交机构进行监视外，主要是对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馆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视和间谍活动。

对苏情报战，始终是哈尔滨日伪警察特务、宪兵机构的重要间谍活动。1940年初，伪哈尔滨警察厅日本人副厅长园田莞尔根据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的命令，与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共同派遣警宪人员组成特别外事班，组成秘密侦谍机构，专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为侦谍目标从事谍报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苏联的动向尤为关注。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为侦察苏联方面的情报，命令伪满各地日本宪兵队在苏联驻伪满各主要城市的领事馆周围的适当地点，配置固定监视哨所，并配备固定情报人员。根据这个命令，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为侦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活动，命令伪哈尔滨警察厅实施“光”工作计划。按照这项计划，该厅外事科于1942年4月设立了一个秘密侦察机构，代号为“光”的工作班。

“光”工作班在伪哈尔滨警察厅对面，日本外务省公馆（现为黑龙江省政府参事室址、吉林街60号）内设立“光”工作班事务所，实际上是该工作班的秘密据点。“光”工作班班长为日

本人警佐松井，配备30余名秘密侦探人员，包括特工、翻译、摄影、司机等，全部是日本人。还配有两台专门用于尾随跟踪用的汽车。

“光”工作班在南岗花园街与木介街（今耀景街）的拐角，位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右前方的日本军官宿舍（现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楼顶设立了秘密监视哨所。哨所配备紫外线探测仪、高倍望远镜、高速红外摄影机等仪器，不分昼夜地了望、监视苏联总领事馆内的活动。紫外线探测仪直对领事馆正门，每当有人进出领事馆时，人影就会遮断紫外线，顿时警铃大作，真是连一只蚂蚁都难以躲过警戒视线，而时刻准备着的配有高倍望远镜头的摄影机拍摄下出入人的照片，工作班的人员立即乘坐备用的小汽车尾随跟踪，侦察其行动。

“光”工作班成员除从事间谍活动外，还豢养了一批密侦和特务腿子，为他们效劳搜集情报。哈尔滨大道馆中学校教员管某就是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的密探，1943年至1945年间，受特务机关派遣打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内，充当该馆工作人员的日语教师。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系警佐、日本人相泽雅一同她联系，利用其可以自由出入苏联总领事馆的方便条件，让她搜集总领事馆内的情况。

伪哈尔滨南岗警察署白俄警官西亚努依金警佐是该署外事科主任，在日本人大藪武雄的指示下，收买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内学校女教员得米多莉耶娃，利用她施美人计，接近苏联总领事巴乎尔依耶夫。搜集领事馆内的壁报、废弃文件，盗窃往来信件，领事馆工作人员工作日记等活动。并将其提供给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由日本人从中了解掌握苏联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第十六辑）